

當代港澳

STUDIES ON HONG KONG & MACAO



2004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出版

第2期

当代港澳
2004 年第 2 期
(总第 23 期)

目 录

澳门回归 5 周年专辑

本刊顾问： 许锡挥 郑佩玉 主 编： 陈广汉 周运源 副 主 编： 陈丽君 袁持平 郭天武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 三角洲研究中心 电 话： (020) 84113279 E-mail： puhkmac@zsu.edu.cn 邮政编码： 510275 登记证号： 粤 O 第 1105 号 刊 期： 逢 6 月 15 日 12 月 15 日出版 本期出版日期： 2004 年 12 月 15 日	特 稿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 杨允中 (1) 澳门回归后的社会问题分析 陈欣欣 (8) 经 济 新时期、新机遇与新澳门 ——从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的发展谈起 周运源 (21) 澳门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制度与新路向 郑天祥 钟韵 (25) 澳门银行业的状况与发展对策 霍 杰 (29) 澳门博彩经营权的开放与发展 刘 媛 (32) 社会与文化 回归后的澳门社会状况探讨 陈丽君 (37) 1960 年以后澳门文学叙事中的澳门意识 黎熙元 (41) 学术动态 机遇、挑战与未来发展路向的选择 ——加强澳门中小企业竞争力学术研讨会综述 周多天 (46) 中心简讯 (48)
--	---

本刊声明

- 本刊所发表署名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 本刊所刊登的图文均保留版权，请勿擅自转用。

“一国两制” 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杨允中*

一、历史性变革、历史性进步

今年 12 月 20 日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五周年,这五年过得很快,也过得很充实,特区发展壮大,生活在特区的居民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特区建设者、成为特区发展、进步的见证人。此时此刻,笔者同样思绪万千,要表达的想法很多,要说的话不少。下面谨对澳门特区五年来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提出几点初步判断。

(一) 经济迅速复苏,民生逐步改善。经济、民生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广大市民切身利益所在。五年前澳门是在经济低谷中走向回归的,当时正值连续四年负增长,市场不景,失业率高企,政府几乎不存储备。从根本上、长远上观察,依靠“一国两制”所带来的制度性保障与信心保障,澳门回归后的加速发展是可以预期的,但澳门五年来发展速度之快、形势之好,则是许多人包括熟悉澳门事务的人所始料不及的。通过“固本培元、稳健发展”方针和“博彩旅游为龙头、服务业为基础、其它产业协调发展”产业定位的推出,以及“以民为本”、依法施政理念的贯彻,通过全澳各界不失时机的开拓开创,以 CEPA、跨

境工业区、内地居民自由行、泛珠三角合作框架等体现国家政策支持的措施出台,今天,澳门不仅扩大开放的博彩业市场旺盛,而且包括地产业在内各经济领域都充满生机;不仅保持整体经济连续四年逐步增长,而且由 2002 年开始已进入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周期。其中,2002 年增长 10%、2003 年增长 15.6%、2004 年上半年为 36% (一、二季分别为 25.6% 和 47.5%), 全年达到 20%—25% 或以上颇有希望。预期 2004 年全澳人均 GDP 将历史性地突破 2 万美元,人文发展指标 (HDI) 有望达到高发达国家平均值 0.900 以上的水平。一个对外高度开放、结构相对多元、有生机活力、具国际竞争力、可保持持续发展的现代微型产业体系有望及早建立;一个市场活跃、就业面逐步扩大、财政持续结余、初步安居乐业的局面正在形成。

(二) 认真实践“一国两制”,坚持依法施政。由 1999 年 12 月 20 日历史性回归到现在的五年间,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沿着“一国两制”康庄大道阔步前进的五年。全面落实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全面落实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这是史无前例的崭新课题,对于只有 27.3 平方公里面积、45 万居民的澳门,其意义尤其非同小可,不

* 澳门大学校长高级顾问兼澳门研究中心代主任、协调研究员 (教授)

容低估。刚刚顺利完成的第二任行政长官选举,何厚铨先生以 99% 的高票当选,再次证明有一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好特首,是澳门人的幸运。无可否认,特区政府在推进依法施政过程中并非做到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特区有待改进、完善的方方面面还很多。但任何不存偏见、肯于坚持理性思维的人不能不承认,五年来特区社会稳定、行政运作稳定,政通人和、朝气蓬勃的现实,有效地验证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或者说澳门特区这五年实践“一国两制”是成功的,说成功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带有留有余地成份,说已经取得开创性的巨大成功也并不过份。贯彻“一国两制”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政府和绝大多数居民都能把维护国家主权、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维护民族尊严作为本身的自觉行为。贯彻“一国两制”的另一项基本要求是,作为当家作主、自行掌握命运的特区建设者,要认定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澳门社会现实出发,从澳门各界居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以及现实可行性出发,有效地充分地利用“两制”下的有利发展机遇和空间,力求全面建立起公正、廉洁、高效的施政体系,并开创一个全面参与型公民社会,使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落实指针不断得以提高。在澳门特区这样言论高度自由的多元文化社会,不能讲不存在不同理念和不同声音,但总体观察,各界居民对一些重大事务的认知是有很高共识的,社会发展主流是健康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三) 发扬文化优势,坚持宽容宽松、和谐共进的社会文化环境。历史的演进和现实吸引力证明,澳门的文化积淀是深厚的,开发价值是全方位的。回归后的澳门有“一国两制”的保障,其文化优势尤其值得重视。现在,人们都开始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观察,“一国两制”本身就是古老中华文化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理念在新形势下的集中发扬,其构思独创性、理念兼容性和利益共享性等特点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是邓小平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方面,而且也是导致特区得以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人们一再呼吁,要充分利用澳门的文化优势,其实构成澳门文化优势的成份很多:作为载体的古建筑古艺术是文化,发生在澳门有历史推动作用的事件、人物也是文化;

写入历史或给人普遍认同的重大发展成果是文化,潜移默化、渗透在人们日常言行中的好传统好作风也是文化。在澳门这块莲花宝地,人们以东西文化交汇点而自豪,人们也同样以尊重兼爱的平等精神、以热情友善的待客之风、以宽容宽厚的包容心情、以守望相助的邻里友爱来营造特区的精神大厦。谦逊礼让、兼容和谐是有教养有礼貌、有信心的表现,而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全面否定一类行径恰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当然也是没有市场的。

(四) 提升公民意识、建设新型社会。五年来特区的发展变化是令人瞩目的,其中包括居民身份变化、认知变化、心态变化。这五年也为未来五年、十年以至更长阶段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面对未来恐怕依然是任重道远,对特区政府是如此,对广大居民也是如此。因为经济也好、政治也好、文化也好,都要靠人去创造、去发展,所以,政府要推行“以民为本”施政理念不动摇,而广大居民提升公民意识,进一步调整身份认知同样重要。要把握未来,首先要提升自信自信意识,把心态调整到位,做到自强自立、主动开拓,顺景时不依赖、逆境下不泄气;要把握未来,就要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风险意识和前瞻意识,就要认真研究论证,设法降低不确定性。这就要求通过学习、培训,通过普法识法来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法制素质和日益复杂的专业素质,全力把澳门打成一个学习型社会、一个精品型社会,让文明、礼仪、守法、环保成为我们社区、城市的代名词。居民素质和社会综合竞争力是成正比的,综合素质高的人多一个,社会整体竞争力就高一分;离开居民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的普遍提升,新型社会的建设就必然被打折扣。何厚铨行政长官在其第二任参选政纲里明确提出要“实现澳门人综合生活素质全面、持续的提升”^①,这既是特区政府“以民为本”施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又是全澳居民对未来的衷心期盼。

在肯定上述几点同时,人们当然还要关注只

^① 何厚铨:《同建优质社会,共创美好明天》(第二任行政长官参选政纲)第1页。

有五年历史的特区依然伴随着许多未见成熟的方面,诸如社会运行的公平度还待提升,良性法治环境有待进一步营造,弱势群体需要扶持,创新创业精神仍显不足,社会综合竞争力还有很大上升空间,一些居民的合理诉求也可能尚未满足,等等。相信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在新一届任期内将会带领澳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五年后的澳门,上述许多问题会大幅度得到改善,当然,社会永远会在发展中前进、在克服困难中前进,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二、“一国两制”展现的中华文明与东方智慧

“一国两制”是新中国三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古老中华文明与东方智慧在当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典范。“一国两制”构想最后形成是邓小平理论的最有代表性、最核心的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周恩来原有构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更有其科学合理性与客观可行性。

(一) 强大而自信的民族要开放

邓小平把开放当作一个需长期坚持的战略问题,“我们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 50 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世纪前 50 年不变,那么到了后 50 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①

不开放,人类文明的成果就吸收不进来;不开放,就不能互通有无,不能把别人的知识、经验“洋为中用”;不开放必然会导致封建意识、个人专断、一言堂作风泛滥;不开放,就没有发展的参照物,就不能显示我们所选定制度的先进性。故此,开放打开的不仅是国门,也意味着把蕴藏巨大潜能的民族智慧之门打开。

(二) 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是事业成功的

基础

邓小平认为解决香港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作不到三方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变成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②邓小平承诺实行“一国两制”50 年不变,是倡导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典范。业已由《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这两部根本大法加以法制化、定型化的“一国两制”思想,绝对不存在变的理由,不存在变的空间,当前不能变,今后也不能变,正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当然,50 年不变绝不可变成保守、封闭、不求进取的代名词,这里强调的是原有社会制度不变,“一国两制”方针也不变,而社会、经济发展则不仅要“变”而且要“大变”,即大发展、大进步。

(三) 宽松兼容、海纳百川是民族大团结、大统一的基调

5000 年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就是宽松兼容、海纳百川的结果,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也是博取众长、兼容并蓄的产物。如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这个世界上包容量最大的文化又因“一国两制”而增添异彩。海峡两岸之间经济上、文化上实际已经在加速一体化进程,政治上的最后和平统一绝不可能遥遥无期,虽然仍存阻力,但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由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既是一件新事又是一件难事,既是实践又是创新,因此,在坚持基本原则大前提下多讲联合、多讲团结,力求不断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70、10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1、102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146 页。

完善原有关系准则,力求营造一个大包容量、大聚合力的社会环境,把人、财、物这些体现人类文明物化成果的基因、元素凝聚在身边,力求把宽松、宽厚、宽大的“和合”前景多方位、多层次、多向度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是需要认真关注并积极推进的,因为唯“宽”字当头方能形成公平竞争,方能化解矛盾纠纷,方能减小前进中的磨擦与阻力,从而方能有效地调整智力的储存与释放,使民族伟大复兴的人类壮举更早地实现。

(四) 求同存异、互补共存有利于化解矛盾、变敌为友,有利于资源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

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而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①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表明,只要尊重自己所属的中华民族,拥护祖国统一,都是爱国者,都是爱国统一战线队伍的成员。“未来香港政府的主要成份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② 这是民族大团结、国家大统一的需要,也是资源开发合理化、思维取向科学化的标志。

(五) 唯理念创新、大胆突破方可成就大业

基于历史与现实,基于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可行性,推出“一国两制”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大胆创新;提前制定特区根本大法——基本法,以确保过渡期的稳定、发展、繁荣,并确保政权顺利交接,是独具匠心的创新;特区实行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推进爱国者为主体的治港、治澳班子的组成和最广泛的爱国者大团结、大联合,以及坚持循序渐进发展民主,都是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创造性安排。

(六) 以民为本、人文导向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制定”,这是由宪法第 31 条作出的庄

严规定,根据这项规定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化、法制化。作为特区根本大法,基本法为国家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作出明确指引,为特区依法施政设计了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也为实行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作出有效的保障。在特区,以民为本、人文导向,是依法施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其最终归宿点。“民为邦本”这是古已有之的基本理念,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认识渊源。作为“一国两制”主要组成部分的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理念经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多年实践已展现出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可行性。

(七) “一国两制”的基本要素互具关联性

总之,“一国两制”是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由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所组成,其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

“一国两制” = “一个国家” + “两种制度”

= A (坚持一个中国,由中央政府对特殊地区恢复行使主权,特别行政区要正确体现国家主权、要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这是前提与基础) + B (国家主体部分的社会主义 + 国家非主体部分的原有资本主义,即制度上的“井水不犯河水” + 发展目标上的互补共进)

= A + B + C (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港人治港) + D (高度自治) + E (50 年不变)

= A + B + C + D + E —— 一个有完整科学内涵的法制保障体系

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一国两制”所涵盖、包容的五个相关内容,或五个基本要素,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在,随着国家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已不再是构想,它已经被正确地付诸实践,并在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中日益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日益显示出无比的正确性和高度的可行性、可操作性。由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55 年光辉历史上增添了一大亮点,增添既新颖别致又务实理性、值得大书特书加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 页。

② 同上,第 60、61 页。

总结归纳的一章。

三、自我完善、继续攀升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五年来,在何厚铨特首强有力的带领下依法施政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明显成果:社会稳定祥和;经济迅速复苏并转入新的快速发展周期,前 4 年平均增长为 8.1%,其中 2003 年为 15.6%;人民基本上安居乐业,信心指标一再上升;国际社会也予以良好评价。可以讲,澳门已进入前所未有的良性循环阶段,澳门的前景令其 45 万居民感到振奋,也令全国人民为之高兴。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上,江泽民指出:“事实有力地证明:‘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澳门人是完全有能力管理好澳门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澳门确实是一块福地、一块宝地、一块莲花宝地。生活在澳门的人是幸运的,生活在当代澳门的人尤其幸运。这不仅因为澳门被安排的规格很高和受到中央政府、全国人民以及海内外同胞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是因为亲眼见证这场历史性转变之后,他们正在谱写新时代的一部自身发展史;不仅因为他们享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全面保障,同时也因为他们有一位好特首在引路,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宽松和谐发展环境;不仅因为他们生逢其时、与历史同步前进,而同时也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澳门应进一步作好自我定位,不仅要在政治上为实践、验证“一国两制”作出应有贡献,而且要考虑经通过努力尽快发展成一个中等规模、全方位开放、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国际明星城市。为此,要推动建立起一个真正高效、廉洁、问责的政府和一支“以民为本”、服务意识强烈的公务员队伍;要在国际上建立广被认同的良好形象;要培养起眼界开阔、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社会群体,包括具现代企业家精神、敢于迎浪而上的经营者队伍;同时,也要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使新一轮发展更具方向性和目的性。

进入新世纪后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澳门,其发展目标可调整为联系与服务西珠三角及粤西、联系与服务海外华人世界、联系与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交流合作的海内外中小企业合作平台、亚洲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其产业结构是以多元化、有特色的博彩旅游为龙头,以发达的服务业为基础,带动其它产业共同发展,即朝着实施“一国两制”原则的中等规模全方位开放国际性“明星城市”的目标全速进发。“一国两制”是澳门未来发展的一大优势、一大保障,要设法用好政策、用尽政策。中等规模、全方位开放、高国际化是三个前提,规模有限但发展水准无限,要努力加大社会性的开放和扩大国际化程度,使澳门能尽早发展成为一个各项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都不断提升的明星城市,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对于澳门,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下去、如何发展更好的问题。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环是要建立新理念、新思维、新观点、新构想,既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又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对于澳门这个有自身特点的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提倡建立当代新文化内涵、当代新思维是重要而可行的。澳门不应寄望单一产业的发展,包括博彩业在内都不能讲没有风险、没有变量,保持产业结构相对多元化、保持发展思路的多选择性是绝对必要的;澳门不宜继续被“依赖偏好”所左右,要真正建立自强自立、自决自信的坚定信念,顺景时不放松,逆境时不动摇;澳门不宜满足于小生产、小市场、小利益主体的发展格局,要设法建立大市场观、大竞争观、大生存观,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设法找寻自己位置;澳门不宜过份看重短期得失,要建立清醒而务实、积极而可行的长远行动纲领,“人无远谋,必有近失”,有一个较为科学而务实的发展目标,是有责任感、理性化、成熟化的标志;澳门不宜过多地在原有模式下打转,而要通过创新意识的建立与发挥,通过全面而深入的论证,掌握好发展规律,设法向更高、更强目标寻求突破。

在人类文明快速推进的 21 世纪,要正常生存就要培育自身的生机活力,就要训练与释放自身的潜在智能,就要提高自身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

义；要加速发展，就要正确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就要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就要建立科学、理性、务实的现代市场观、价值观。在任何情况下，建立优势、参与竞争，首先要解决一个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问题，即每个人都要作好自我心理调整，都要放下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我们已经告别贫困、落后，我们还要告别封闭、保守；我们既要告别自私贪婪，也要告别无知幼稚，既要告别封建意识体系的狭隘，也要告别资本主义的短视。“关键仍在于全体市民在各自的起点上把握机遇，凭本身不懈的努力和前瞻的智慧，切合社会的潮流与时代的走向，从中创造自己灿烂的明天。这正是我们信心之所在，奋进方向之所在，更是全体澳门市民未来福祉之所在。”^①

现代文明的真谛是甚么？可以讲，其真谛就在于合理利用资源与理性开发智力。现代文明同传统文明的根本区别是甚么？可以讲，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主流群体的理性思维得以全面形成、坚持与完善。现代文明的核心推动力在哪里？可以讲，其核心推动力就在于坚持“公平竞争”这几个字。现代文明的发展目标是甚么？可以讲，其发展目标就在于使每个人普遍享有民主、自由，享有高质量的生活，进行高效益的建设性活动，使人的生存价值得到有效的体现，使平等的人格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

人们经常“现代化”不离口，现代化不仅标志各项发展指标位居国际前列，具有可以站得住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也标志着人的观念跟上时代潮流，其思维属开放型、创新型、共赢型；不仅意味着各项经济活动伴随着合理的效益，包括时间在内的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而且也意味着这个社会不论整体还是个体都充满活力，都是公平竞争的积极参与者；不仅预示着在竞争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至少是胜多负少，而且预示着会受到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普遍重视与尊重。这里涉及到社会结构的优化、社会信心的再造、社会文明的重塑，既有具体的经济活力问题，又有非经济层面的政治信心问题，既有影响深远的竞争力重塑问题，又是适度的合理导向问题。

在澳门，存在着多种声音的正常表达机制，存在着多种利益的合理协调机制，存在着多种前景

的清醒选择机制。在澳门，基于公平竞争又照顾到历史传统，多元共存、多维发展、多体受益，当然偶而发生鼠窃狗偷、虚讲排场、争名夺位现象也不稀奇。在澳门，勇于开拓、敢于取胜、积极创新、共进双赢的现代理性思维业已扎根，渐成主流，团结向上、求实进取、诚信服务、与时俱进的科学探索精神受到公认、得到扶持，而低沉消极、自私损人、毁信食言、内耗磨擦等社会行为难以畅行无阻。因为人们越来越明白，防止幸运之神擦边而过的最好办法是自己保持清醒，是自己善于捕捉机遇，是自己肯于保持健康心态、保持活力常在、斗志不减。因为挑战和机遇这两个动态性、相对性概念，从来不是互相孤立的两回事，而是有其内在联系的一个整体，挑战的背面是机遇，机遇的背面是挑战，故此，正常而准确的表述似应为“挑战中的机遇或挑战性机遇”，“机遇中的挑战或机遇性挑战”。

世间从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社会，但要力求使我们社会的基本制度和运作模式不断完善；现实中难以形成百分之百的公平公正，但要想方设法使权利的行使和利益的分配有最大合理度。我们要全力营造的既应是一个法制社会、又应是一个法治社会，亦即既应是一个法制相对完善的社会，又应是一个官方依法行政、执法到位，民间法治意识强烈的社会。而为了做到这一步，政府的指引、推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民主、廉洁的原则是至关重要的，要求有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理解、支持、主动配合、形成合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实践“一国两制”的过程，既是一场制度创新过程又是一场观念转换过程，既是一场价值提升过程又是一场命运开拓过程，既是一场能量聚合过程又是一场知识积累过程。在澳门，实践“一国两制”这篇大文章刚刚开篇，新实践要求新思维、新理念、新创造、新作为。澳门这个舞台不大，但上演的剧目都是空前的一场大戏；这里的空间小，但要建立大视野。小和大只是事物的基本属性、基本特征之一，而非全部，大的体系有其大的优势，小的体系也有小的长处；正因为

① 何厚铨：《2002 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第 35 页。

小就更应坚持走出一条精品化发展路线,整体发展要力求精品化,个体发展也要力求精品化;小而美可以形成共识,可以形成统一体,可以形成发展模式,要在“微”字上作足功夫,在“小”字上动够脑筋;小但发展速度不慢,小但发展层次不低,小但作用可观,小但同样可以受到别人重视与尊重。

四、认真探索实践“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

作为实践“一国两制”理论的有效载体,或者讲作为验证“一国两制”发展模式正确性、可行性与有效性的载体,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发挥的作用是多重的,也是多向的。它的验证示范作用、导向指引作用、平衡协调作用在广泛共识基础上有条件得到充分发挥。这个小社会发生了大转变,这个小舞台上演的是大剧目,这个小地方可以有很大作为。它得天独厚,潜质突出,前景广阔,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它应该也可以发挥一份不容无限夸大、更不容易低估的重要作用。

尽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取得良好开局,尽管在澳门实践“一国两制”已取得巨大成功,不过要对其作出比较准确、比较公正的评估,并寻求认识的系统化,仍然是项难度极大的挑战。但深入探讨一下“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模式并非不具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依笔者观察,实践“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其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八点内容。

1. 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是 13 亿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国;一个统一的主权、一部规范 13 亿人行为的宪法。

2. 两种制度:大陆主体部分社会主义制度与港澳地区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两制形成互补;目前全国有两个特别行政区、两部基本法。

3. 三个有利:特区依法施政的成效要以是否有利于体现国家主权、有利于稳定繁荣和长治久安、有利于居民福祉增进和社会协调均衡来验证;三大管治权力:特区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

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4. 四个不变: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原有法律基本不变、原有生活方式不变、自由港地位不变;四种意义:实践“一国两制”具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国际意义、理论创新意义。

5. 五大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爱国者为主体澳人治澳原则、某些领域保留中央最后决定权的高度自治原则、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原则、原则性灵活性相结合——充分调动资源、团结大多数原则。

6. 六种意识:主权意识,即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主人翁——爱国者意识;法治意识,或宪法意识、基本法意识;公平公正公开民主廉洁意识;公仆服务意识;开拓创新意识。

7. 七大作用:特区正在发挥验证作用、示范作用、导向作用、平衡协调作用、孵化催生作用、缓冲中和作用、加固支撑作用。

8. 八种关系:要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尊重中央政府与高度自治关系,稳定与繁荣发展关系,行政主导与合理制衡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改革创新与循序渐进关系,依法施政与正确理解基本法关系,坚定信念与理性思维关系。

综上所述,澳门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澳门人要思考的问题也很多。作为当代澳门人、作为特别行政区的正式居民、作为一个爱国者,进一步坚定自己的“一国两制”意识,进一步加深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完全必要。如果说特区的社会核心价值尚待取得广泛共识,那么,首先要肯定社会核心价值的内涵,依笔者体会,爱国爱澳、法治意识、公平竞争、自主开发、和谐共进等都应成为构成社会核心价值的必要因素。

澳门已进入其历史发展的崭新阶段,澳门已选定其健康发展的最佳路向。在这里,“一国两制”的巨大生命力得到充分展现;在这里,“一国两制”的可靠说服力受到高度认同;在这里,资源的重组、优化、开发得以快速推进;在这里,智慧的种子有条件生根、开花、结果。我们为澳门这块莲花宝地的更好明天祝福,我们为伟大祖国的更好明天祝福。

(责任编辑:周运源)

澳门回归后

的

社会发展情况

陈欣欣

一、引言

社会指标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状况与进程,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朱庆芳、吴寒光,2003:17)因此社会指标体系亦称之为社会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有五大功能:描述、解释、评价、监测、及预测社会发展的状况。(朱庆芳、吴寒光,2003:5-6)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皆有其目标,比如中国的发展要达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为了促进各国在社会及经济方面平衡发展,联合国提出了八项社会发展指标供各国参考,包括:(朱庆芳、吴寒光,2003:7-8)人口控制;健康;住宅;营养;文化教育;就业与社会安全;人身安全;及其它一般指数。

澳门是个只有大约 45 万人口的小地区,不能以国家级的发展指标所涵盖;但由于它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是实现一国两制的重要基地;它的发展进程在 13 亿人口的中国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为澳门制作一套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尤为重要,以描述、解释、评价、监测、及预测其社会发展的状况。然而,在制作指标之先,必须清晰澳门的社会发展目标为何?才能制定一套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来量度澳门的发展目标是否达到;所以,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课题。

社会发展指标的制定是包括数据分析与民意调查两部分所组成,前者作为对客观数据之量性分析,后者则作为市民对社会发展的感受及生活满意程度的理解;因此,社会发展指标的研究是需要通过社会调查来检验及搜集资料的。本文的目的是根据澳门现存的社会发展数据资料以比较本身社会在回归前后几年的变化,以明其发展的状况;以便作为日后构建社会发展指标的参照。

二、从澳门社会发展相关数字看回归前后的社会发展状况

由于澳门以社会生活素质的提升为社会发展的重点,因此建议以人口、医疗、社会服务、教育、文娛康乐、传媒/电讯、交通、罪案与法律、就业、整体及公共财政等社会发展相关数字为回归前后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参照,也作为日后建构社会发展指标的基础。

(一) 人口

澳门人口变化方面,自 1995 年的 415,030 人增加至 2003 年的 448,495 人,增幅率为 8.06%,而每年澳门人口的增幅都是平稳地上升,但变化不大。(表 1)

表 1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人口变化的情况

年 份	人口总数 N	增幅率 (%) [*]	增幅率 (%) ^{**}
1995	415,030	/	/
1996	415,172	(0.03)	/
1997	419,417	(1.02)	/
1998	425,190	(1.38)	/
1999	429,632	(1.04)	/
2000	431,506	(0.44)	/
2001	436,686	(1.20)	/
2002	441,637	(1.13)	/
2003	448,495	(1.55)	(8.06)

* 与前一年比较

** 与 1995 年 (基年) 比较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29。

《澳门居住人口估计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统计暨普查局, 2002: 3, 7, 9, 11, 13, 15。

《澳门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澳门居住人口岁组方面, 0-9 岁组别自 1995 年的 71,844 人下跌至 2003 年的 45,409 人, 由 1995 年 0-9 岁组别与澳门居住人口比例为 17.31% 下降至 2003 年的 10.12%, 该组别的变化颇大。值得注意的是 60 或以上岁组别则在慢慢地上升着, 由 1995 年的 40,146 人增加至 2003 年的 46,091 人, 表示澳门出现人口老化的现象。(表 2)

表 2 1995-2003 年澳门人口岁组的变化情况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0-9 岁 N	71,844	70,823	68,144	64,673	61,243	57,490	52,028	48,592	45,409
与人口比率 (%)	(17.31)	(17.06)	(16.25)	(15.21)	(14.25)	(13.32)	(11.91)	(11.00)	(10.12)
10-19 岁 N	55,482	59,903	63,189	67,123	71,358	74,452	77,651	79,334	79,698
与人口比率 (%)	(13.37)	(14.43)	(15.07)	(15.79)	(16.61)	(17.25)	(17.78)	(17.96)	(17.77)
20-29 岁 N	67,294	67,251	66,015	65,177	63,753	61,870	60,568	59,570	60,786
与人口比率 (%)	(16.21)	(16.20)	(15.74)	(15.33)	(14.84)	(14.34)	(13.87)	(13.49)	(13.55)
30-39 岁 N	91,772	90,083	87,531	85,366	83,598	81,320	79,258	76,337	74,232
与人口比率 (%)	(22.11)	(21.70)	(20.87)	(20.08)	(19.46)	(18.85)	(18.15)	(17.29)	(16.55)
40-49 岁 N	63,987	62,965	68,096	73,552	77,307	80,407	84,756	89,100	92,948
与人口比率 (%)	(15.42)	(15.17)	(16.24)	(17.30)	(17.99)	(18.63)	(19.41)	(20.17)	(20.72)
50-59 岁 N	24,505	24,682	26,685	29,367	32,363	35,507	40,237	44,547	49,331
与人口比率 (%)	(5.90)	(5.95)	(6.36)	(6.91)	(7.53)	(8.23)	(9.21)	(10.09)	(11.00)
60 岁 N	40,146	39,465	39,757	39,932	40,010	40,460	42,188	43,707	46,091
与人口比率 (%)	(9.67)	(9.51)	(9.48)	(9.39)	(9.31)	(9.38)	(9.66)	(9.90)	(10.28)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年 9: 29。

《澳门居住人口估计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统计暨普查局, 2002: 3, 7, 9, 11, 13, 15。

《澳门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在 1995 年至 2003 年澳门居住人口的男女组别的变化不大, 都是以女性居民稍为多一至两个百分点。澳门的出生率不断在下降, 由 1995 年的 14.4‰ 减至 2003 年的 7.2‰, 而澳门的死亡率则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中国合法移民方面, 在 1999 年有 4,984 人移民到澳门, 这年为最多中国合法移民的一年。(表 3)

表 3 1995 年至 2003 年澳门出生率、死亡率及中国合法移民之情况

年 份	出生率‰	死亡率‰	中国合法移民
1995	14.4	3.3	1,921
1996	13.2	3.4	1,857
1997	12.0	3.1	1,937
1998	10.4	3.2	2,521
1999	9.6	3.2	4,984
2000	8.9	3.1	2,919
2001	7.5	3.1	4,621
2002	7.2	3.2	3,110
2003	7.2	3.3	2,451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7：30，31。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2000：48，49。

《统计年鉴 2001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二) 医 疗

在 1995 年澳门医护场所数量为 315 间，到 1999 年升至 386 间。到了 2001 年开始，增加了中医及治疗服务，所以医护场所的数量增至五百多间，在 2003 年为止，澳门已有 600 间医护场所；由 1995 年每 1,000 居民只得 0.76 间医护场所增至 2003 年每 1,000 居民有 1.34 间医护场所。（表 4）

表 4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医疗服务提供数量

年份	医护场所 N	与整体人口比率 (‰)	护理服务设备 (床位)N	与人口比例	卫生护理服务 工作人员 N	与人口比例
1995	316	(0.76)	1,110	1:374	2,561	1:163
1996	318	(0.77)	1,075	1:387	2,592	1:161
1997	348	(0.83)	1,047	1:401	2,970	1:142
1998	369	(0.87)	1,058	1:402	3,135	1:136
1999	386	(0.90)	1,055	1:408	3,250	1:133
2000	360	(0.83)	1,113	1:388	3,235	1:134
2001	551	(1.26)	1,099	1:398	3,313	1:132
2002	568	(1.29)	1,135	1:390	3,415	1:130
2003	600	(1.34)	1,114	1:403	3,659	1:123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6：87、88、89、92。

《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7：91、92、93、98。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2000：105、106。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对于澳门护理服务设备（床位），在 1995 至 2003 年间之变化不大，都是维持在一千至一千一百多张，而床位与人口比例方面，1999 年是床位最紧张的一年，达 1:408 之高，即 408 名居民才有一个床位，最低为 1995 年的 1:374，即 374 名居民便有一个床位。（表 4）

澳门卫生护理服务工作人员，在 1995 年至 2003 年间不断增加，由 1995 年的 2,561 人升至 1998 年的 3,135 人，到了 2003 年澳门卫生护理服务工作人员人数增至 3,659 人。而在九年间之卫生护理服务工作人员与人口比例是缓慢下降，由 1995 年的 1:163 降至 2003 年的 1:123，即 1995 年 1 名卫生护理服务工作人员要为 163 名居民服务，而 2003 年 1 名卫生护理服务工作人员只为 123 名居民服务。（表 4）

(三) 社会服务

澳门的社会服务设施在 1995 年至 2003 年不断增加，在 1995 年社会服务设施为 147 间，到了 2000 年上升至 169 间，其后由于澳门为了加强防治药物方面服务，所以增加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社会服务设施，所以到了 2003 年社会服务设施增加至 184 间。而与整体人口比率方面，以 1995 年最低 (0.35‰)，最高为 2001 年 (0.42‰)。（表 5）

表 5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之社会服务设施数量

年 份	社会服务设施 N	与整体人口比率 (‰)
1995	147	(0.35)
1996	146	(0.35)
1997	158	(0.38)
1998	156	(0.37)
1999	166	(0.39)
2000	169	(0.39)
2001	182	(0.42)
2002	180	(0.41)
2003	184	(0.41)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6: 114。

《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120。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130。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四) 教 育

1995 年至 2003 年澳门的中学数目有着明显的变化, 由 1995 年的 37 间增至 2003 年的 60 间, 整体人口比率由 1995 年 0.09‰ 增至 2003 年的 0.13‰; 而小学则有 1995 年的 74 间增加到 2003 年的 83 间。(表 6)

表 6 1995 年至 2003 年澳门学校数目之情况

年份	学前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小学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中学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师范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高等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护士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1994/1995	67	(0.16)	74	(0.18)	37	(0.09)	2	(0.01)	10	(0.02)	2	(0.01)
1995/1996	69	(0.17)	78	(0.19)	38	(0.09)	2	(0.01)	10	(0.02)	2	(0.01)
1996/1997	66	(0.16)	77	(0.18)	40	(0.10)	2	(0.01)	14	(0.03)	2	(0.01)
1997/1998	65	(0.15)	81	(0.19)	47	(0.11)	/	/	25	(0.06)	/	/
1998/1999	62	(0.14)	83	(0.19)	50	(0.12)	/	/	26	(0.06)	/	/
1999/2000	61	(0.14)	83	(0.19)	49	(0.11)	/	/	9	(0.02)	/	/
2000/2001	60	(0.14)	81	(0.19)	52	(0.12)	/	/	11	(0.03)	/	/
2001/2002	60	(0.14)	80	(0.18)	58	(0.13)	/	/	11	(0.02)	/	/
2002/2003	62	(0.14)	83	(0.19)	60	(0.13)	/	/	12	(0.03)	/	/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6: 63。

《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63。

《统计年鉴 1997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8: 63。

《统计年鉴 1998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9: 63。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81。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在 1995 年澳门的学前学生有 20476 人, 与澳门人口的比率为 49.34‰, 到了 2003 年学前学生只有 12,737 人, 与澳门人口的比率为 28.4‰, 学生人数减少了 7,739 人, 与澳门人口比率则下降了 20.94‰; 随着学前学生人数下降, 小学学生人数亦在 1998/1999 年度开始减少, 而与澳门人口比率则由 1998/1999 年度的 112.35‰ 下跌至 2002/2003 年度的 92.61‰。相反地, 中学学生人数则不断上升, 由 1994/1995 年度的 21,813 人增加至 2002/2003 年度的 43,999 人, 而与澳门人口比率从 1994/1995 年度的 52.56‰ 上升至 2002/2003 年度的 98.10‰。还有高等教育方面的学生人数亦不断增加, 由 1995/1996 年度的 6,145 人增加到 2002/2003 年度的 11,995 人。(表 7)

表 7 1995 年至 2003 年澳门学生情况

年份	学前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基本/小学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中学 + 职业技术学校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高等 + 师范 + 护士训练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1994/1995	20,476	(49.34)	45,153	(108.80)	21,813	(52.56)	6,145	(14.81)
1995/1996	19,770	(47.62)	46,703	(112.49)	23,440	(56.46)	6,933	(16.70)
1996/1997	18,964	(45.22)	47,300	(112.78)	25,458	(60.70)	6,625	(15.80)
1996/1998	18,291	(43.02)	47,235	(111.09)	28,280	(66.51)	8,381	(19.71)
1998/1999	17,354	(40.39)	48,269	(112.35)	31,782	(73.97)	10,014	(23.31)
1999/2000	16,083	(37.27)	47,059	(109.06)	34,761	(80.56)	7,094	(16.44)
2000/2001	14,978	(34.30)	45,474	(104.13)	38,156	(87.38)	8,358	(19.14)
2001/2002	13,638	(30.88)	43,709	(98.97)	41,132	(93.14)	8,520	(19.29)
2002/2003	12,737	(28.40)	41,535	(92.61)	43,999	(98.10)	11,995	(26.75)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6: 66。

《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66。

《统计年鉴 1997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8: 66。

《统计年鉴 1998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9: 66。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83。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1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五) 文娱康乐

澳门的博物馆在不断增加, 由 1995 年的 4 间到 2003 年的 15 间, 增加了 11 间之多; 而戏院方面, 则由 1996 年的 11 间减至 2003 年的 9 间。(表 8)

表 8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文娱设施情况

年 份	博物馆 N	与整体人口比率(‰)	戏院 N	与整体人口比率(‰)
1995	4	(0.010)	/	/
1996	6	(0.014)	11	(0.026)
1997	6	(0.014)	10	(0.024)
1998	7	(0.016)	11	(0.026)
1999	10	(0.023)	10	(0.023)
2000	13	(0.030)	10	(0.023)
2001	14	(0.032)	11	(0.025)
2002	15	(0.034)	11	(0.025)
2003	15	(0.033)	9	(0.020)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77。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92。

《统计年鉴 2001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澳门的体育场地在这 9 年间是不断增加, 如运动场馆, 由 1995 年的 80 间到了 2003 年的 273 间, 与澳门人口比率由 1995 年的 0.19‰增至 2003 年的 0.61‰; 游泳池亦由 1995 年的 27 间增至 2003 年的 59 间, 与澳门人口比率由 1995 年的 0.07‰上升至 2003 年的 0.13‰。(表 9)

表 9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体育场地情况

年份	露天场地 (包括大小场地)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运动场馆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游泳池 (包括室内和室外)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1995	198	(0.48)	80	(0.19)	27	(0.07)
1996	201	(0.48)	92	(0.22)	28	(0.07)
1997	160	(0.38)	140	(0.33)	42	(0.10)
1998	160	(0.38)	142	(0.33)	43	(0.10)
1999	192	(0.45)	225	(0.52)	49	(0.11)

年份	露天场地 (包括大小场地)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运动场馆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游泳池 (包括室内和室外)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2000	191	(0.44)	218	(0.51)	49	(0.11)
2001	249	(0.57)	243	(0.56)	49	(0.11)
2002	257	(0.58)	244	(0.55)	49	(0.11)
2003	244	(0.54)	272	(0.61)	59	(0.13)
年份	田径场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特别场地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健康径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1995	2	(0.0048)	10	(0.024)	4 *	(0.0096)
1996	3	(0.0072)	11	(0.026)	4 *	(0.0096)
1997	6	(0.0143)	32	(0.076)	2	(0.0048)
1998	6	(0.0141)	31	(0.073)	2	(0.0047)
1999	7	(0.0162)	45	(0.105)	13	(0.0303)
2000	7	(0.0162)	45	(0.104)	13	(0.0301)
2001	8	(0.0183)	32	(0.073)	13	(0.0298)
2002	8	(0.0181)	32	(0.072)	13	(0.0294)
2003	14	(0.0312)	33	(0.074)	13	(0.0290)

* 1995、1996 年为绿化区。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7：81。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2000：96。

《统计年鉴 2001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六) 传媒/电讯

澳门所出版的报纸(包括中文、葡文和英文)数量不大,维持于 10 至 11 份,最多为 1995 年有 12 份报纸在澳门发行;而电台方面(包括政府、私人),在 95 年至 03 年间有很大的改变,由 95 年的 45 间到 2003 年的 129 间。(表 10)

表 10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报纸及电台数量

年 份	报纸 N	与整体人口比率 (‰)	电台 N	与整体人口比率 (‰)
1995	12	(0.029)	45	(0.108)
1996	11	(0.026)	65	(0.157)
1997	11	(0.026)	92	(0.219)
1998	11	(0.026)	95	(0.223)
1999	11	(0.026)	95	(0.221)
2000	10	(0.023)	97	(0.225)
2001	11	(0.025)	99	(0.227)
2002	11	(0.025)	104	(0.235)
2003	11	(0.025)	129	(0.288)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6：87。

《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7：77。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2000：92。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由于电讯的发展迅速,在这九年间有着很大的变化。在固定电话方面,由于首两年之数字是包括了流动电话,所以其数量是较之后年份为多,其中以 1996 年 206,154 为最多,由 1997 年开始,把固定电话和流动电话分开,从这些数字可以知道,固定电话都保持着一一定的数目,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与人口比例则维持着每 3 个人便有 18 条固定电话线;相反,流动电话的数量有着很大的变化,在 1998 年有 67,042 用户,人口比例为每 7 个人便有 1 个流动电话,而在 2000 年已经增加到 120,957 个用户,则每 4 个人便有 1 个流动电话,到了 2003 年流动电话用户增加至 198,696,与人口比例为每 3 个人便有 1 个流动电话。(表 11)

表 11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电讯发展的情况

年 份	固定电话 N	与人口比例	流动电话 N	与人口比例	国际互联网 N	与人口比例
1995	189,856 *	1:3	/	/	/	/
1996	206,154 *	1:3	/	/	/	/
1997	169,591	1:3	50,653	1:9	5,846	1:72
1998	173,893	1:3	67,042	1:7	9,516	1:45
1999	178,445	1:3	92,081	1:3	17,034	1:26
2000	176,837	1:3	120,957	1:4	27,346	1:16
2001	176,450	1:3	155,822	1:3	34,403	1:13
2002	176,106	1:3	172,699	1:3	41,517	1:11
2003	174,621	1:3	198,696	1:3	48,312	1:10

* 包括流动电话。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7：444。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2000：395、397。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在国际互联网方面，在 1997 年 5,846 用户到 2000 年的 27,346 用户，在三年间其用户数量增加了 4 倍之多，其人口比例由 1997 年的每 72 个人便有 1 个互联网用户减至 2000 年的每 16 个人便有 1 个互联网用户，到了 2003 年互联网用户增加到 48,312 个，即每 10 个人便有 1 个是互联网用户。（表 11）

（七）交 通

在过去的 9 年间澳门行驶车辆数量不断增加，由 1995 年的 70,888 辆增加至 2003 年的 131,797 辆，而与澳门人口比例为 1995 年的每个 6 人便有 1 辆车提升至每 4 个人便有 1 辆车。在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交通意外不断增加，由 1995 年的 6,718 宗（16.19‰）到了 2003 年的增加至 11,764 宗（26.23‰）。（表 12）

表 12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行驶车辆情况

年 份	行驶车辆数量 N	与人口比例	交通意外数字 N	与整体人口比率(‰)
1995	70,888	1:6	6,718	(16.19)
1996	82,766	1:6	6,949	(16.74)
1997	96,321	1:5	7,688	(18.33)
1998	107,251	1:4	7,935	(18.66)
1999	114,247	1:4	7,950	(18.50)
2000	114,218	1:4	8,278	(19.18)
2001	115,770	1:4	9,854	(22.57)
2002	123,669	1:4	10,523	(23.83)
2003	131,797	1:4	11,764	(26.23)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6：422。

《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7：428、431。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2000：380、383。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澳门道路行车线，在这几年间都不断增加，由 1999 年的 321.2 公里到 2003 年的 345.2 公里，增加了 24 公里之多，而与车辆数目比例则由 1999 年的每 1 公里有 356 部增加至 2003 年每 1 公里有 382 部车辆。（表 13）

表 13 1995 年至 2003 年澳门道路行车线情况

年 份	道路行车线 Km	与车辆比例
1999	321.2	1:356
2000	324.2	1:353
2001	333.1	1:348
2002	341.0	1:363
2003	345.2	1:382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八) 罪案与法律

在过去的 9 年间，澳门整体罪案数字由 1995 年的 7,181 宗增加至 2003 年的 9,920 宗，增幅达 38.14%；以 1995 年的人口总数及罪案数字比例来计算的罪案发生率为 17.30‰，2003 年则升为 22.12‰；反映澳门的罪案发生率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表 14）

表 14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犯罪数字的情况

年 份	总数 N	增幅率 (%) *	与基年比较增幅率 (%) **	与整体人口比率 (‰)
1995	7,181	/	/	(17.30)
1996	8,576	(19.43)	/	(20.66)
1997	8,162	(-4.83)	/	(19.46)
1998	8,487	(3.98)	/	(19.96)
1999	9,262	(9.13)	/	(21.56)
2000	8,925	(-3.64)	/	(20.68)
2001	8,905	(-0.22)	/	(20.39)
2002	9,088	(2.06)	/	(20.58)
2003	9,920	(9.15)	(38.14)	(22.12)

* 与前一年比较。

** 与 1995 年比较。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7：139。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2000：149。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在过去 9 年间澳门被监禁人数由 1995 年的 482 人，增加至 2003 年的 928 人，监狱工作人员人数由 1995 年的 300 人增加至 2003 年的 469 人，而工作人员与囚犯的比例由 1995 年的 1:1.6 增至 2003 年的 1:1.9，其相差不大；而澳门居民与被监禁人数之比例，则由 1995 年的 1.16‰增加至 2003 年的 2.04‰，变动不算大。（表 15）

表 15 1995 年至 2003 年澳门监狱工作人员及囚犯的情况

年 份	工作人员 N	囚犯人数 N	工作人员与囚犯比例	囚犯与整体人口比率 (‰)
1995	300	482	1:1.6	(1.16)
1996	328	625	1:1.9	(1.51)
1997	325	657	1:2.0	(1.57)
1998	347	711	1:2.1	(1.67)
1999	347	788	1:2.3	(1.83)
2000	494	847	1:1.7	(1.96)
2001	475	886	1:1.9	(2.03)
2002	469	928	1:2.0	(2.01)
2003	484	913	1:1.9	(2.04)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1997：145。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156。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在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少年感化院的院童增加不少, 由 1995 年的 26 个增加至 2003 年的 72 个, 而院童与澳居民的比例由 1995 年的 0.063‰ 至 2003 年的 0.161‰。而少年感化院的工作人员数目亦随着院童的增加而有所上升, 由 1995 年的 25 个增加至 2003 年的 42 个, 而工作人员与院童的比例为 1995 年的 1:1.04 上升至 2003 年的 1:1.71。(表 16)

表 16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少年感化院工作人员及院童情况

年 份	工作人员 N	院童人数 N	工作人员与院童比例	院童与整体人口比率 (‰)
1995	25	26	1:1.04	(0.063)
1996	28	25	1:0.89	(0.060)
1997	37	23	1:0.62	(0.054)
1998	36	14	1:0.39	(0.032)
1999	37	23	1:0.62	(0.054)
2000	38	37	1:0.97	(0.086)
2001	41	54	1:1.32	(0.124)
2002	40	67	1:1.68	(0.152)
2003	42	72	1:1.71	(0.161)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146。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157。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在 1995 年至 1999 年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的人数为一起计算, 而在 2000 年至 2002 年法院工作人员数目没有改变, 有 225 人, 到了 2003 年则增加至 233 人。而检察院工作人员则每年都有所增加, 由 2000 年的 155 人增至 2003 年的 171 人。在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的警务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由 1995 年的 5,047 人增加至 2003 年的 6,579 人, 而与澳门人口比率从 1995 年的 12.16‰ 上升至 2003 年的 14.67‰。(表 17)

表 17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法院、检察院及警务工作人员的情况

年 份	法院 工作人员 N	法院工作人员 与整体人口比率 (‰)	检察院 工作人员 N	检察院工作人员 与整体人口比率 (‰)	警务人员 N	与整体 人口比率 (‰)
1995	229 *	(0.55)	/	/	5,047	12.16
1996	227 *	(0.55)	/	/	5,244	12.63
1997	290 *	(0.69)	/	/	5,701	13.59
1998	320 *	(0.75)	/	/	5,815	13.68
1999	326 *	(0.76)	/	/	5,954	13.86
2000	225	(0.52)	155	(0.36)	6,383	14.79
2001	225	(0.52)	160	(0.37)	6,441	14.75
2002	225	(0.51)	170	(0.38)	6,535	14.80
2003	233	(0.52)	171	(0.38)	6,579	14.67

* 1995 年至 1999 年工作人员数目包括了法院及检察院工作人员。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6: 132。

《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144。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155。

《统计年鉴 2001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2003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行政暨公职局, 2003: 110。

《2002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行政暨公职局, 2002: 104。

《2001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行政暨公职局, 2002: 49。

《2000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行政暨公职局, 2001: 48。

《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 99》行政暨公职局, 2000: 57、59。

《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 98》行政暨公职局, 1999: 57、59。

《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 97》行政暨公职司, 1998: 57、59。

《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 96》行政暨公职司, 1997: 57、58。

(九) 就 业

在过去 9 年间, 澳门的就业人口由 1995 年的 180,400 人增加至 2003 年的 202,600 人, 而失业人口亦在不断上升, 由 1995 年的 6,700 人增至 2003 年 12,900 人, 其失业率则有 1995 年的 3.6% 上升到 2000 年的 6.0%, 其中以 2000 年的失业率最为高, 有 6.8%; 就业不足率则以 2001 年为最高, 有 3.6%。(表 18)

表 18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就业及失业情况

年 份	就业人口	失业人口	失业率 %	就业不足率 %
1995	180,400	6,700	3.6	/
1996	197,500	8,700	4.3	/
1997	200,600	6,500	3.2	0.8
1998	201,000	9,600	4.6	1.5
1999	202,500	13,800	6.4	1.3
2000	195,300	14,200	6.8	3.0
2001	202,800	13,900	6.4	3.6
2002	200,600	13,400	6.3	3.4
2003	202,600	12,900	6.0	2.7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6: 141、142。

《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155、156。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165、166。

《统计年鉴 2001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在 1995 年至 2003 年间, 澳门的就业人口以从事服务、销售及同类工作人员为占多数, 平均每年有四万多人; 其次为文员方面, 平均有三万多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亦有一些职业较少人从事, 如专业人员, 平均有数万人从事, 不过专业人员的就业人口是不断增加, 而最少人从事的为渔农业熟练工作者, 平均每年只有万多人从事这个职业。(表 19)

表 19 按职业身分之 1995 年至 2003 年澳门就业人口情况

(1, 000 人计)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立法机构成员、公共行政高级官员、社团、企业领导人员	9.5	11.3	11.8	11.5	12.1	12.1	10.6	12.0	12.2
专业人员	4.2	4.8	5.1	5.4	6.1	6.2	6.1	6.8	7.6
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	13.6	13.9	14.3	15.7	17.6	17.3	17.2	18.4	18.9
文员	33.7	33.4	36.4	36.3	36.9	38.8	36.9	35.3	38.2
服务、销售及同类工作人员	32.9	41.3	42.0	52.4	40.5	40.4	40.3	42.4	40.2
渔农业熟练工作者	0.6	1.4	1.5	1.4	1.3	1.3	1.3	1.3	1.8
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	24.4	27.0	29.2	27.5	24.8	24.1	24.8	22.5	22.5
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	25.7	28.6	27.8	28.0	29.9	25.7	29.6	27.0	24.9
非技术工人/未确实职业人士	35.6	35.7	32.5	32.8	33.2	34.1	36.1	34.9	36.2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6: 143。

《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157。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167。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在过去 9 年间, 澳门最多人从事的行业为制造业, 其次为批发及零售业; 而农业、畜牧业、狩猎及林业、捕鱼业和采矿业为最少人从事行业, 其中采矿业由 1999 年起已没有人从事这行业。(表 20)

表 20 按行业分类之 1995 年至 2003 年澳门就业人口情况

(1, 000 人计)

年份	农业、畜牧业、狩猎及林业	捕鱼业	采矿工业	制造业	电力、气体及水的生产及分配	建筑	批发及零售业	住宿、餐厅、酒楼及同类场所	运输及贮藏及通讯
1995 *	0.4		0.04	39.2	1.4	17.2	46.2		10.4
1996 *	0.4		0	40.6	1.3	14.8	54.4		12.3
1997 *	0.3		0	41.4	1.5	14.4	53.2		13.7
1998	0.2	0.1	0.1	41.5	1.4	21.0	33.5	23.2	13.7
1999	0.1	0.1	0	44.5	1.2	16.3	31.3	21.7	15.0
2000	0.1	0.3	0	39.3	0.8	16.2	30.9	21.6	15.0
2001	0	0.2	0	44.1	1.0	16.9	30.2	22.4	14.5
2002	0.1	0.2	0	40.9	1.2	15.0	30.8	23.1	12.8
2003	0.1	0.5	0	37.1	1.3	16.3	32.8	22.1	14.2
年份	金融业务	不动产业务、租赁及向企业提供的服务	公共行政、防卫及强制性社会保障	教育	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	团体、社会及个人的其它服务	雇佣人的家庭	国际组织及其它领土以外的机构	不详
1995 *	11.1		54.3						0.3
1996 *	13.1		60.3						0.2
1997 *	1.7		62.5						0.1
1998	5.7	8.3	16.4	6.7	4.1	20.0	5.0	0.1	0.1
1999	6.0	9.7	16.7	9.2	5.2	19.8	5.6	0.14	0.1
2000	7.1	10.8	16.7	8.3	5.3	22.2	5.5	0.1	0.1
2001	6.1	10.7	16.0	8.1	5.1	22.1	4.8	0.1	0.3
2002	6.2	10.9	16.9	9.9	4.2	23.0	4.8	0.1	0.3
2003	6.2	11.9	17.8	9.6	4.6	23.5	4.3	0.1	0.3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6: 144。

《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158。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168、169、170。

《统计年鉴 2000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c-pub.html>。

在 2001 年所做的人口普查中得知, 在 2001 年 7 月份以工作收入为 2,000 - 3,999 澳门元为高, 有 58,107 人, 占澳门就业人口的 27.02%; 其次为 4,000 - 5,999 澳门元有 48,645 人, 占澳门就业人口的 22.62%。而 <2, 000 澳门元的有 17,177 人, 占澳门就业人口的 7.98%, 而 ≥20,000 澳门元的有 12,012 人, 占澳门就业人口的 5.59%。(表 21)

表 21 2001 年 7 月份工作收入统计之就业居住人口数目

工作收入 (澳门元)	就业居住人口 N	占就业人口比率 %
< 2,000	17,177	7.98
2,000 - 3,999	58,107	27.02
4,000 - 5,999	48,645	22.62
6,000 - 7,999	28,486	13.25
8,000 - 9,999	15,533	7.22
10,000 - 11,999	15,318	7.12
12,000 - 13,999	7,462	3.47
14,000 - 19,999	9,916	4.61
20,000	12,012	5.59
无酬家属帮工	2,403	1.12
总数	215,059	100.00

资料来源:《2001 人口普查》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网页 <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cen-pub.html>。

(十) 整体及公共财政

澳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在 1996 年至 1999 年为负增长, 1995 年的增长率为 3.3%, 1999 年为 -3.0%, 而由 2000 年开始则渐渐增加, 由 2000 年的 4.6% 增长率, 到了 2003 年则为 15.6% 的增长率。(表 22)

表 22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情况

年份	本地生产总值(1,000 澳门元)	增长率(%)
1995	55,526,251	(3.3)
1996	55,293,517	(-0.4)
1997	55,139,122	(-0.3)
1998	52,618,754	(-4.6)
1999	51,021,436	(-3.0)
2000	53,380,560	(4.6)
2001	54,560,222	(2.2)
2002	60,031,687	(10.0)
2003	69,409,642	(15.6)

资料来源:《本地生产总值》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网页 <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indicator/c-pib-indicator.html>。

在 1995 年至 2003 年间, 澳门的出口总值由 1995 年的 42,048,730 千澳门元升至 2003 年的 68,228,232 千澳门元, 其中以出口服务所占的比例较出口货物为高。而进口总值方面, 亦由 1995 年的 26,318,990 千澳门元增加至 2003 年的 38,237,115 千澳门元, 升幅较出口总值为少, 而进口货物所占的比例较进口服务为高。

在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有关澳门政府收支方面, 都没有太大的变动, 在公共收入方面, 由 1995 年的 15,000,583 千澳门元升至 2003 年的 15,370,626 千澳门元; 而公共开支方面, 亦由 1995 年的 14,240,687 千澳门元微升至 2003 年的 15,712,968 千澳门元。(表 23)

表 23 1995 年至 2003 年间澳门政府支出及收入情况

(1, 000 澳门币)

年 份	公共收入	公共开支
1997	15,000,583	14,240,687
1998	15,548,388	15,505,724
1999	16,942,597	16,636,176
2000	15,338,502	15,024,270
2001	15,641,649	15,220,788
2002	15,226,922	13,486,946
2003	15,370,626	15,712,968

资料来源:《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350。

《统计年鉴 2001 年》、《统计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三、总 论

综合以上澳门回归前后社会发展的主要数字, 归纳有以下几点发现:

1. 人口: 人口稳步增加, 每年平均百分之一。出生率下降, 死亡率保持低水平。40-49 岁之年龄组别人口占最多, 20 年后人口老化情况颇严重。
2. 医疗: 医护场所及卫生护理工作服务工作人员增加, 配合人口增长所需, 但护理服务设备(床位)则相对减少。
3.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设施稍有增加。
4. 教育: 中学教育服务明显增加, 因出生率下降, 学前及小学教育服务没有多大的变化。学前、小学的学生人数有明显的下降, 中学及高等则有明显的增加。
5. 文娱康乐: 博物馆数量有颇大的增幅, 露天场地、运动场馆、游泳池、田径场等有增加趋势。
6. 传媒/电讯: 报纸数量没有多大变化, 电台(包括网上电台)数量明显上升。固定电话与人口比例不

变,但流动电话则明显普及,而国际互联网更为快速增加。

7. 交通:车辆与人口比例保持不变(1:4),但交通意外则增加不少,而道路与车辆比例日见紧张,车辆增幅高于道路增幅。

8. 罪案与法律:犯罪数字有上升趋势,监狱工作人员与囚犯人数比例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感化院的工作人员与院童比例则日见紧张,每名工作人员需要为更多院童服务。司法人员包括法院及检察院人员数字与整体人口比率没有多大变化,但警务人员则相对持续增加人手。

9. 就业:就业人口缓步增加,而失业人口增加则较明显,就业不足率亦有所增加,但 2003 年则稍减退。担任专业、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的就业人口明显增加。从事不动产业务、租赁及向企业提供的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明显增加。工作收入以每月澳门币 2,000 - 3,999 为最普遍。

10. 整体及公共财政:本地生产总值(GDP)近年增幅幅度较大,出口总值明显上升,较进口总值的升幅为大。公共收入与公共开支的增减不太明显。

总的来说,从以上社会发展数字看来,澳门从回归前的负生产总值及高失业率发展到回归后的双位百分比生产总值及失业率的缓降,加上医疗、社会福利、教育、文娱康乐服务及设施的增加,流动电话及国际互联网的普及,反映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与改善,唯犯罪数字的增加与道路使用的日益紧张;这正是经济增长的同时亦需要特别关注的情况,那样社会才得以平衡发展。

参考资料:

《统计年鉴 1995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6: 63、66、87、88、89、92、114、132、141 ~ 144、422。

《澳门统计年鉴 1996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7 年: 29、30、31、63、66、77、81、91、92、93、98、139、144 ~ 146、155 ~ 158、428、431。

《统计年鉴 1997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8: 63、66、444。

《统计年鉴 1998 年》统计暨普查司, 1999: 63。

《统计年鉴 1999 年》统计暨普查局, 2000: 48、49、81、83、92、96、105、106、130、149、155 ~ 157、165 ~ 170、350、380、383、395、397。

《澳门居住人口估计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统计暨普查局, 2002: 3, 7, 9, 11, 13, 15。

《统计年鉴 2001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统计年鉴 2002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澳门年鉴 2003 年》<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ae-pub.html>。

《2003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行政暨公职局, 2004: 110。

《2002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行政暨公职局, 2003: 104。

《2001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行政暨公职局, 2002: 49。

《2000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行政暨公职局, 2001: 48。

《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 99》行政暨公职局, 2000: 57、59。

《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 98》行政暨公职司, 1999: 57、59。

《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 97》行政暨公职司, 1998: 57、59。

《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 96》行政暨公职司, 1997: 57、58。

《2001 人口普查》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网页 <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pub/c-cen-pub.html>。

《本地生产总值》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网页 <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indicator/c-pib-indicator.html>。

《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21 日 <http://www.chinatibetnews.com/BIG5/channel99/139/145/200211/21/4418.html>。

朱庆芳、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田单「建立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可行性研究」于《澳门公共行政杂志》第二十六期; 行政暨公职局: 2003 年 12 月: 1205 ~ 1216。

(责任编辑: 黎熙元)

新时期、新机遇与新澳门

——从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的发展谈起

周运源

【摘 要】 自从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经济、社会等得到全面发展。澳门社会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并对澳门在新世纪的新发展充满信心，本文在回顾 5 年来澳门繁荣发展的基础上，作者对今后澳门的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 6 个方面思考。

1925 年，我国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先生曾经道出了感人肺腑的“我要回来”的呼喊，代表了作为游子“澳门”，渴望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热切情怀。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末期，经过中华优秀儿女的努力奋斗，澳门终于在 1999 年 12 月 20 日顺利回归祖国，闻一多先生当年的呐喊，早在五年前已经成为现实，澳门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澳门在全面落实澳门基本法，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治体制下实行“一国两制”，使澳门向着持续稳定和繁荣发展。

—

澳门回归五年来，在特区政府卓有成效的领导和全体澳门人民的共同努力以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相关资料显示，2003 年澳门特区实现的 GDP 达到 633.7 亿澳门元（当年价），对比上年增长 16.7%，实现的进口总额达到 220.97 亿澳门元，对比上年增长 8.7%，出口总额达到 207 亿澳门元，对比上年增长 9.4%，而零售业的销售总额达到 62.68 亿澳门元，对比上年增长 20%，当年的公共总收入达到 141.2 亿澳门元，对比上年增长 27.4%，公共总支出达到 114.63 亿澳门元，对

比上年增长 22.7%。此外，由于在中国整体进一步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内地居民到港澳及海外旅游的长足发展，在内地居民自由行的带动下澳门近年来的入境人数显著增加。例如，2002 年澳门的入境人数达到 1153 万人次，对比上年增长 12.2%，2003 年澳门的入境人数又达到 1188.8 万人次，对比上年增长 3.1%，与此同时，澳门酒店的入住率也连续 3 年保持在 60% 以上。其中 2003 年达到 64.3%。同样，澳门的博彩业也得到发展，2003 年澳门的博彩服务出口比上年增长 31.1%，而博彩总收益也比上年增长 27.5%。这种状况与中国内地实行“自由行”政策密切相关，据统计显示，到 2003 年底仅以“自由行”方式访澳的内地人数就达到 60 万 8 千人次，而进入 2004 年内地进入澳门的旅客人数又有新的增长，仅据 2004 年 1 至 6 月份的统计，澳门入境旅客人数达到 773.5 万人次，对比上年同期的 506.9 万人次增长 52.6%。在对外贸易方面，2004 年 1—7 月澳门的出口额已达到 124.7 亿澳门元，对比上年同期增长 6.6%，而进口贸易额则达到 154.1 亿澳门元，对比上年同期增长 25.9%。在本地生产总值方面，继 2002 年增长 10% 的基础上，2003 年的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 15.6%，创下澳门有统计纪录以来的新高。2003

年澳门的人均 GDP 达到 17782 美元, 对比 1992 年的 14351 美元增长 24%。澳门特区成立以来, 外汇储备也得到较大的增加, 2003 年澳门的外汇储备达到 43 亿美元, 比 1999 年的 28 亿美元增长 51.5%。同时 2003 年澳门特区的银行总资产达到 194 亿美元, 对比 1999 年的 173 亿增长 12.1%, 2003 年澳门的进口总值达到 27 亿美元, 对比 1999 年的 20 亿美元增长 34%, 出口总产值 2003 年已达到 26 亿美元 (包括本地产品及再出口货物) 对比 1999 年的 22 亿增长 18.3%。

二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澳门特别行政区肩负着稳定、持续和全方位发展的重任。面对国内国际新的发展态势, 特别是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更高阶段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审时度势, 重新定位澳门的经济社会等的发展战略, 无疑成为摆在澳门当局面前的重要问题。2004 年 8 月, 何厚铨先生成功连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特首, 为今后澳门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政制等方面的保障。早在 2004 年 6 月初, 何厚铨先生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中指出: “澳门凭借良好的对外关系和 CEPA 的效应, 正加快打造多个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 这些平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促进、协助葡语系国家、欧盟国家和内地之间的中小企业, 加快双边贸易和投资, 或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为内地首先是泛珠三角的中小企业的外拓内引, 扮演好积极的服务角色。”在 2004 年 9 月中旬举行的“首届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市长论坛”上,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也在演讲中指出, 澳门在定位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 服务业为主体, 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正同时努力打造内地特别是泛珠三角地区的商贸服务平台; 内地与葡语系国家经贸联系与合作的平台; 全球华商联络与合作的服务平台。并且认为这些平台的建立和运作, 将有利于强化澳门原有的对外关系。事实上,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 她所具有的沟通内地与海外特别是欧盟国家的桥梁作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发挥着, 而且与时俱进在继续拓展新时期对外关

系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例如, 澳门与粤西商贸平台的建立, 2003 年 10 月成功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葡语系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期间, 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签定了包含 8 项经济贸易合作的行动纲领, 参加此次论坛的国家一致同意在澳门设立常设秘书处, 以保障相互间计划和方案的实施, 这充分显示了澳门在其对外关系中的特殊的桥梁地位和作用。同时, CEPA 签署以后, 澳门特区政府于 2004 年 1-2 月间联合内地、香港先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举办了大型的推广活动。此外,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 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优势, 采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特别是泛珠三角地区的全面合作关系。据有关资料显示, 截止 2003 年 11 月, 澳门在内地的投资项目已达到 7458 个, 投资总金额达到 44.5 亿美元。^①而近年来, 澳门除了参与“9+2”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外, 还先后扩大与长三角、环渤海湾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的联系与合作,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澳门的外拓效益。

三

回顾澳门回归后的岁月, 也是使人感到荣幸和充满信心的日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和贯彻“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依靠全体澳门同胞, 力挫重重困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障碍, 使澳门社会环境日臻良好, 澳门居民安居乐业等, 从内部各种因素促进和保证整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澳门回归以后, 有关澳门博彩业的赌权开放一直是澳门特区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行业间反复协商以及政府积极推动, 澳门的博彩业终于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较长时间 (1962 年以来) 的独家经营, 在 2002 年实现了开放, 使澳门博彩业的格局形成了多家竞争经营的格局, 除了原有的澳门旅游有限公司旗下的 11 家娱乐场由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博彩承批公司) 经营外, 另外的金沙娱乐场 (由美国威尼斯集团投资管理) 已于 2004 年 5 月 18 日正式开场, 随后的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首家在

^① 《澳门杂志》2004 年 6 月号总第 40 期

澳门单独经营的赌场也于同年 7 月开业,使澳门目前的赌场数目达到 14 家,初步形成了澳门博彩业多家竞争经营管理发展的新格局。

在新的历史时期,澳门承负着更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如何与时俱进,把握机遇参与竞争,谋求进一步持续稳定繁荣发展,这是摆在澳门人面前不容回避的历史抉择,也是对澳门人的考验。

何厚铨先生早在 2004 年初提出的“中国心、澳门情”的参选政纲中就提出:要落实“一国两制”加强对外交往和合作,并直接、主动参与区域合作。并认为 CEPA、泛珠三角(9+2)、跨境工业区等一系列区域合作安排,为澳门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机会和动力。以“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努力争取澳门特别行政区整体生活和发展质量的优化,在各个事务领域和层次上,实现澳门人综合生活素质全面、持续的提升。笔者认为,这是为澳门今后继续保持繁荣发展描绘出宏伟的蓝图。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司等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进入 2004 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澳门的经济社会各项指标又有新的增长。例如 2004 年第 2 季度实现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 192.3 亿澳门元(下同),对比上年同期的 129.2 亿元增长了 48.9%(名义升幅),而实际增长为 47.5%。2004 年第 2 季度的总进口额达到 71.61 亿元,对比上年同期增长 25.5%,出口总额达到 58.42 亿元,对比上年同期增长 8.9%。2004 年 1 至 2 季度,澳门的旅客入境人数达到 733.5 万人次,对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52.6%,其他经济指标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凸显出澳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格局。在世界经济日益区域化、国际化发展,竞争发展格局日趋激烈的条件下,澳门特别行政区要实现稳定发展的战略目标,笔者认为,必须注意解决如下主要问题:

(一)以“9+2”泛珠三角合作为契机,全面拓展与内地省区的联系合作

包括内地 9 省区和香港澳门在内的泛珠三角,简称“9+2”自 2003 年被提出、论证并在 2004 年 6 月正式签署的“泛珠三角合作发展框架协议”以来,泛珠三角已成为世界性区域整合的重要组

成部分,泛珠三角职能部门,例如交通、科技等合作协议先后签定,2004 年 9 月首届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市长论坛的召开以及各省区工商行政管理高层联席会议的召开和相关协议的形成,充分凸显出 9+2 合作发展的日益具体化和务实性。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下,澳门应抓住这一重要的发展机遇,采取切实的政策和措施,在泛珠三角区域整合中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例如,利用澳门发展博彩旅游业的优势,全面拓展泛珠三角大区域的旅游合作,通过建立有特色的旅游平台,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实现利益双赢。又如,可以考虑利用澳门中小企业发展特殊性,积极探索建立澳门与泛珠三角地区拓展中小企业合作的平台,既有利于澳门中小企业在内地的的发展,又有利于继续发挥澳门联系海外市场,特别是欧盟、葡语系国家的中介作用,为内地尤其是泛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发挥桥梁作用等。当然,还有中介服务业、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澳门也有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广阔空间。

(二)以实施 CEPA 为突破口、增强澳门产品对内地市场的占有率

我们知道,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签署和实施,无疑为澳门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大好时机,必将促进澳门经济社会今后继续稳定发展。CEPA 自 2004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以来,澳门首批三类产品已顺利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包括 4.1 吨包装胶袋,100 多件的电汇排和创盈数码科技制品。这些产品率先抓住机遇进入内地市场,为澳门产品利用 CEPA 机遇大规模进入内地市场作出了示范,使澳门厂商对 CEPA 实施的信心增强,要求享受零关税产品的申报书陆续增加,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内地市场对澳门产品的吸引力。据 2004 年 1 至 9 月份的统计,内地进口澳门 CEPA 零关税货物共 51 宗,货物值达到 139.1 万澳门元,可减免关税 8.9 万元人民币。因此,澳门有关方面应当加强对实施 CEPA 效果的宣传力度,并且采取切实的措施,扶持澳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与时俱进,更新产品营销观念,进一步加强对内地市场发展态势的研究,发挥澳门微型经济灵活多样、澳门产品渗透力强的优势,促进更多的符合 CEPA

要求的“澳门制造”产品以零关税进入内地的广阔市场。

(三) 继续深化与欧盟、葡语系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与合作

澳门与欧盟、葡语系国家的联系与合作有悠久的历史。2004 年 5 月欧盟成员国国家由 15 个发展为 25 个, (即欧盟东扩计划的部分实现) 这格局无疑为澳门继续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与合作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有利于澳门产品进一步拓展海外国际市场。与此同时, 澳门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扮演中国内地拓展欧盟、葡语系国家的联系与合作的桥梁, 纽带和中介作用也在一定程度得以保持和发挥。尽管这些作用会因为中国内地的全面对外开放的深化而受到一定的影响, 然而, 澳门在其中的长时期积累下来厚实的基础, 仍然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四) 进一步更新现代企业发展的理念, 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新世纪全球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态势, 给澳门近 2 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而澳门近年持续增长的经济格局, 同样为澳门的中小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 澳门的中小企业为着在今后取得更快、更好的创新发展, 必须考虑更新企业发展的理念, 用符合当代世界经济发 展的现代理念, 赋予中小企业拓展的整个过程, 包括创新企业的营商行为,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增强企业的品牌意识、以诚信赢得市场的理念以及适度提高企业 R&D 能力等, 以促进澳门中小企业取得与时俱进的成长与发展。

(五) 继续提高博彩旅游业的经营服务水平

众所周知, 澳门的博彩业的税收是澳门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据澳门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 2004 年第 2 季度, 澳门的博彩总收益 (未计赏钱) 达到 99.1 亿澳门元, 第 2 季博彩服务出口对比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82.0%, 旅客总消费 (未包括博彩消费) 对比上年同期的实质增长 1.3 倍。^①事实上, 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快速增长是与中国内地实施“自由行”分不开的。据统计, 以“自由行”方式来澳的旅客占内地来澳旅客的比例已由这一政策实施初期的 7.7% 增至 33.7%, 2004 年

第 2 季度以“自由行”方式来澳的旅客达到 76.7 万人次。(2004 年第 2 季全部澳门入境数目为 398.3 万人次) 面对今后博彩旅游业继续强劲发展的态势, 澳门应当在强化博彩旅游设施建设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博彩旅游业的现代化服务水平。

(六) 继续搞好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发展

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以来, 经济得到繁荣发展的同时, 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充分显示出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实践成效。随着澳门在新时期外拓内引发展战略的实施, 澳门除了在做好对外联系与合作的同时, 继续做好内部的协调也同样十分重要, 这就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全体澳门居民, 同心同德协调一致, 进一步发挥澳门本身的优势, 利用澳门的有利条件, 全面处理并协调好澳门本身的经济、科技、社会和教育、文化等事业的新发展, 使一个以人为本、吉祥、和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澳门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今后澳门在特别行政区第 2 任长官何厚铨先生的领导下,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帮助下, 通过澳门人的努力奋斗, 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朝着稳定繁荣继续发展, 澳门作为同香港一样的东方明珠, 一定会发展得更加灿烂耀眼。

参考文献:

1. 《澳门杂志》2004 年 6 月号总第 40 期
2. 《澳门经贸之窗》2004 年 7 月号总第 40 期
3. 澳门《华侨报》2004 年 7 月 17 日; 8 月 20 日
4. 杨允中主编《中小企业发展与综合竞争力提升》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出版 2004 年 9 月
5. 《澳门研究》2004 年各期 澳门基金会出版
6. 《澳门经济季刊》2004 年第 2 期, 澳门统计暨普查司、澳门经济局、澳门金融管理局联合出版

(责任编辑: 黎熙元)

^① 《澳门经济季刊》2004 年第 2 季

澳门经济发展的

新机遇,新制度与新路向

郑天祥^① 钟 韵^②

一、澳门经济发展面临历史最大机遇

(一) 回归前未能抓住发展的机遇

16 世纪 50 年代至 18 世纪中期,澳门曾依附葡萄牙人编织的远东国际贸易网而成为名扬海外的中转贸易港^[1]。18 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葡萄牙远东贸易航线的衰落,澳门失去了中西方贸易最大港市地位。直到回归前夕,澳门的殖民管治一直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曾先后依附于广州、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但都未能抓住各次机遇,建立起引领区域发展的产业体系,即便是 70 年代加工制造业曾一度兴起,也不过是作为香港制造业的车间而得以发展的。

在回归前的 4 年,澳门经济年年呈负增长,1996 年到 1999 年 GDP 增长率分别是 -0.4%、-0.3%、-4.6% 和 -3.0%^[1] (表 1)。同时,城市治安恶化、澳珠区域合作不尽人意、部分服务业的垄断程度过高(专营行业产值在澳门 GDP 中的比重一度超过了 60%)^[2],以及政制、法制、公务员制度、廉政和治安方面均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因素都对澳门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同时也阻碍了澳门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但值得庆幸的是:泡沫经济在澳门回归前已被挤破。

(二) 回归后自身环境的改善

回归 4 年多来,澳门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经济年年增长,2000 年到 2003 年 GDP 增长率分别是 4.6%、2.2%、10.1% 和 15.6% (表 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3 年在非典的影响下,澳门经济仍出现了 15.6% 的增速,在非典过后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更是创下了 24.6% 的历史新高^[1]。

表 1 1996 - 2003 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率

年 度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增长率(%)	-0.4	-0.3	-4.6	-3.0	4.6	2.2	10.1	15.6

资料来源:《2002 年澳门统计年鉴及资料汇编》

回归后,澳门政府力图通过创新与改革重塑地区的比较优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结束了电讯和博彩业的垄断专营,这也为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奠定了基础。其中,在澳门垄断经营历史最长(专营 72 年)、影响范围最大的博彩业在实现开放经营权后,博彩收入连创新高,2003 年创造了 100 亿澳门元的历史纪录。

但是,澳门的经济结构仍然单一,除博彩业外,其他产业的规模都较小,产业前后关联较弱。同时,澳门作为珠三角西翼中心的地位并不明显,表现在其与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的经济贸易联系程度较低:改革开放以来,澳门在粤投资总额仅 30 亿美元,且其中五成是在回归之后进入

①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

②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博士,讲师

的^[1]；截至 2002 年 6 月止，全国吸引澳门资金为 44.56 亿美元；2002 年粤澳进出口贸易额为 8.78 亿美元，仅占广东 2213.9 亿美元进出口总值的 0.39%^[1,2]。在首届泛珠三角经贸洽谈会中，9 个内地省区期望的外资投入额中澳门签约量最少，在洽谈会期间与内地企业签署合同项目 28 个，签署投资金额仅为 23 亿元人民币，占签约金额总量的 1/100 左右，而香港签约额则达 500 多亿。虽然如此，从 CEPA 制定过程中澳门政府较香港政府更为主动，同时也较澳门商界积极这一状况，可以反映出澳门政府努力为商界创造一个有利环境的主动进取态度。

（三）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机遇

澳门回归后，不仅自身内部条件有所改善，周边环境也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其发展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 6 个方面：

1. 中国内地经济发展持续保持良好的势头，2002 年和 2003 年连续两年引资额超过 500 亿美元，其中 2002 年为 527 亿美元，2003 年 535 亿美元^①，成为世界最大的引资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成为了澳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依附对象。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澳门经济的发展将有积极的带动作用。

2. 珠三角区域内几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在近年内相继展开，将大大加强澳门与内地的联系。其中尤以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对澳门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建成后的港珠澳大桥将横跨珠江口，连接东西两岸，大大缩短了香港与澳门、珠海及整体珠江三角洲西翼时间与空间距离，将带动珠三角西翼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促进大珠三角客源、货物、资金和贸易的深入交流。澳门的业内人士认为，澳门将是港珠澳大桥最快、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2]。大桥建成后，由香港进入澳门的游客将大幅增加，港澳间的物资流通能力将大幅提高，同时澳门的就业机会也将因此大幅增加。

3. 香港经济开始复苏，迪斯尼乐园计划将于 2005 年开业。在 19 世纪鸦片战争后，澳门的经济活动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从属于香港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自由行开始前，香港也是澳门最大的旅游客源市场，据资料统计，澳门的入境游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途经香港进入澳门的。因此，

香港的经济复苏态势对澳门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香港经济在回归后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等重大事件的影响，2004 年经济开始复苏，这对澳门经济也是一个利好的因素。正在兴建的迪斯尼乐园也计划在 2005 年开业迎客，这将吸引更多的亚洲游客前往香港，换言之，澳门的潜在旅游目标市场也随着香港潜在旅游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迪斯尼的开业也将对澳门旅游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4. 珠三角建设“世界工厂”，并向高新技术及重化工业方面拓展；同时，澳珠拟共建跨境工业园，合作开发横琴岛。加强与珠三角的合作是促进澳门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中，与珠三角产业发展实现互补，是澳门产业发展的思路之一，珠三角致力于发展制造业，澳门可以发挥自由港的优势，为珠三角的制造业提供转口贸易服务。而加强澳门与珠海的合作，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经形成的共识，目前提出的具体合作内容，有利于两地进行实质性的合作与发展。例如，已于 2003 年 12 月奠基的由珠澳双方共同推动的珠澳跨境工业区在 2004 年已在澳门首次召开了联合招商会，澳门政府希望通过这个工业区的建设优化澳门的产业结构，促进澳门工业多元化，并带动经济整体发展^[1]。事实上，跨境工业区的发展对澳门更直接的作用并不体现在制造业方面，而应是在服务业方面，珠海园区内制造业的发展将有效地促进澳门园区内服务业的发展，包括设计、新产品研发、营销和物流、展示等一系列为生产提供服务的服务。

5. CEPA 效益。CEPA 的整个框架实质上是将中国内地这个全球资本都十分渴求与企盼的巨大市场，向港澳做了一次大开放^[1]。CEPA 的实施将使澳门与内地的联系更为便利，国际资本有可能以在澳门投资作为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跳板，因此，CEPA 将有助于澳门吸引外资。

6. 泛珠三角合作概念的形成及与东盟共建自由贸易区。泛珠三角这一新的区域合作理念的形 成，有助于加强区域内城市间的合作与交流。虽然泛珠三角合作的作用不能在短期内显示出来，

^① 《2004 年世界投资报告》，见 2004 年 9 月 24 日《大公报》。

但从长远来看,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将为澳门的贸易发展提供坚实的腹地。

二、制度创新是抓住机遇、发展新路向的保证

要抓住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要求对观念、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改革,对现行产业发展制度、区域合作制度,乃至社会各项陈旧制度进行改革,是澳门实现新发展路向的根本保证。

(一) 产业发展制度的创新

保守的体制、专营制度、角色僵化(博彩业独大)是目前澳门自由港优势未能充分发挥的根源。澳门是中国也是东亚唯有的两个自由港之一(另一个是香港),具有免税、低税,资金、人员、货物进出自由,无外汇管制等优势^[4]。发展贸易服务型经济是发挥自由港优势的最有效途径,根据澳门目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最有可能创造贸易的是博彩旅游业。但从产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单一依靠博彩业的旅游业将难以带动澳门产业体系的整体发展,因此,必须以丰富旅游业的内涵为发展目标,以博彩旅游业为基础,逐步发展起集会、游乐、购物等于一体的文化旅游。可以认为,澳门将博彩业的经营权开放并引进竞争,只是标志着澳门产业制度创新的开始,而更深层次的产业制度改革还在于将澳门旅游产业内涵丰富化、产业结构完整化。

此外,虽然澳门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与分配性服务的发展水平不及香港,但就其发展为南中国另一个“桥头堡”的发展目标而言,努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和分配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仅有利于澳门的服务业发展,也有利于澳门在与内地的区域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 区域合作制度的创新

CEPA 有一个与过去世界上所有协定都不同的最大特点:它是一国之中不同关税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协定,是一国两制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它在制度上保障了港澳与中国内地的经济整合^[1]。因此,可以以 CEPA 制度安排为契机,加大制度改革力度,创建区域合作新制度,尤其是通过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加强香港、澳门和珠

海的合作关系。例如,在澳门和珠海共同开发横琴岛的项目上,可以进行合作制度创新的试点:横琴岛在行政区划上从属于珠海,但由珠澳两地共同建设和开发,由澳门负责对外联系,招商引资以及建设管理,珠海则主要负责项目的工程建设,使横琴岛通过澳门的促销、利用澳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迅速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一定的知名度。

(三) 社会制度的创新

澳门社会的发育程度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水平都还不高,特别是澳葡长期统治留下的难题较多,要促进澳门经济发展,就必须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全面改革澳门的政制、法制、公务员制度、廉政、治安和专营制度、教育制度,为澳门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支持。其中包括创立健全、高效、廉洁的新体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强化廉政建设,改善治安和营商环境,提高公务员为民、利民、便民的服务意识,打破垄断专营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三、路向选择

对应于澳门发展所面对的新机遇,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澳门的发展角色定位也应实现相应的创新。本文对澳门未来发展路向选择的思考,主要是从其自身角色创新的角度进行的。

(一) 角色创新

将澳门从博彩旅游城市向旅游博彩城市转化,逐步提升文化旅游在旅游业中的比重,最终发展为文化旅游居首位、博彩业退居第二位的旅游业发展格局。

早在 1993 年 1 月举行的纪念葡日友好的研讨会上,澳门传播、旅游暨文化政务司已首次明确提出了澳门旅游业的转型方向:“多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汇聚,形成了澳门本身的特征,除了特别的乡土人情外,本澳是唯一能到处体现东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即要以文化取代博彩成为吸引游客的主导动力。在 1994 年的施政报告中,更郑重表明要以“澳门——文化之都,同为中国之门”作为旅游推广的灵魂,正式为澳门旅游业转型树立了鲜明的旗帜^[3]。

以赌城拉斯维加斯为鉴^[3],发展会展、酒店业、美食、购物、文化娱乐业等内涵丰富的旅游

业,应是澳门旅游业发展的最终选择。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博彩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发展博彩业的社会成本将大于其经济效益,将导致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为此,拉斯维加斯正向会展经济转型。1998 年拉斯维加斯的博彩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47%^[3],到 2002 年,其会展业产值发展到 41 亿美元,居各产业的首位,超过了博彩业的产值 (39 亿美元)^[2]。

(二) 强化国际旅游中心地位

2000 年到澳门旅游的内地游客为 227.47 万人次,占游客总数的 24.82%,居全部入澳旅客数的第二位;2002 年增加到 424.04 万人次,占总数的 36.77%,仍居第二位,但已逼近第一位的香港 (510.14 万人次);2003 年内地游客量上升至 568.11 万人次,首次超过了居第二位的香港 (462.12 万人次),内地游客占游客总量的 47.79%;2004 年 1 月至 8 月,澳门入境游客总数为 10876852 人,其中内地游客为 6223977 人,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88%,占入境游客总数的 57.22%;香港游客为 3393500 人,占 31.19%,台湾游客为 794000 人,占 7.29%,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为 467700 人,仅占入境游客的 4.29%。

而从旅游收益看,2000 年内地游客在澳门消费额为 546155.47 澳门元,占游客总消费的 43.6%,居各地游客消费的首位,这一比例在 2000 年后增长迅速,2002 年内地游客在澳门消费量已达到 1125826.2 万澳门元,占游客消费总数的 67.15%,高居各地游客消费量的首位;2003 年,这一比例更升至 89%。

虽然如资料显示,内地游客在近期内对澳门旅游业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澳门今后的旅游市场开发重点是中国内地。作为东南亚的自由港之一,澳门的旅游业发展应以国际性旅游中心城市为目标,而不仅仅满足于开拓内地市场。旅游发展应以赌权开放、迪斯尼乐园开业、港珠澳大桥建设为契机,致力于开辟国际及港台客源,而不是单纯依赖内地自由行的客源,以便保持澳门国际旅游中心的地位。同时,澳门应以自身旅游接待能力考虑,制定接待国内旅游市场人数的额度指标,必要时提高进入澳门旅游的门槛,以保证其接待能力和质量,保持其国际旅游城市的地位。

(三) 建立桥头堡地位

澳门回归前后,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安排,正有意识、有计划地扶持、提升着澳门独特的经贸优势,并通过一定的组织措施将其纳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体系之中。例如,中央政府将中国与欧盟国家每两年一次科技交流的“尤里卡”会议放在澳门,以发挥澳门作为中国与欧盟国家经济及技术交流的平台作用;2003 年中国商务部又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设在澳门,确立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平台的地位^[1]。

以中国欧盟国家科技交流会议、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为起点^[1]。通过旅游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空运物流服务、离岸业务服务和内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平台等六大服务平台,整合完善澳门的经贸服务平台,创造和发展最适宜人居与创业环境,将澳门建设成为为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世界华商、台商、东盟进军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总部经济区”。

四、结 论

澳门经济正处在历史性重大转型时期,其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阻力,只有以文化旅游作为产业发展龙头,通过充分发挥自由港作用保持国际性城市的优势,才有可能吸引跨国公司的大量入驻,进而发展为以商务会展为主的总部经济区。澳门只有选择这个新的发展经济路向才能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枢纽,提高其在区域内的经济地位。期望澳门不要再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 封小云,杨道匡. CEPA: 澳门在大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机遇与角色. 澳门理工学院出版, 2004 年 7 月
2. 施汉荣,邓开颂,丘杉主编. 全球化大潮中的粤港澳经济区——历史、现状与前瞻. 澳门环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04
3. 郑天祥,雷强. 从东方蒙地卡罗到东方拉斯维加斯. 特区经济. 1998 (4): 42-43
4. 赵大英. 从澳门所处的经济环境看澳门未来发展. 地理学报, 1999 (6): 487-495

(责任编辑:周多天)

澳门银行业的状况及发展对策

霍 杰

一 澳门银行业的发展阶段

银行业是澳门金融业的主体。到 2002 年澳门的银行总数达 22 家, 银行的总资产达 1518.935 亿港元。澳门银行业的发展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是萌芽阶段 (1902 ~ 1970 年)。70 年代以前, 澳门只有 1 家银行 (澳门大西洋银行), 它除了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外, 还发行货币, 担当澳门地区的中央银行和澳门库房储金局职能。这个时期的银行业务主要是存贷款业务等。第二为起步阶段 (1970 ~ 1982 年)。从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 因澳门享有出口配额, 香港工业向澳门转移, 给澳门经济注入了活力; 80 年代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 澳门经济开始走入快速发展时期, 给澳门银行业提供了发展条件。1970 年 8 月 26 日澳门政府颁布《银行银号管理条例》, 该法例明确规定“允许在澳门创立一个银行制度, 使能适当地将已在进行中的工商业重要发展作为基础”。该条例同时对各类信贷机构的设立、经营范围、遵守规则、禁止事项、罚则以及受监察等作了规定。到 1982 年, 澳门有 15 家商业银行。第三为发展阶段 (1982 ~ 1993 年)。1982 年颁布新银行法《信用机构暨金融机构管制法令》, 即新银行法。这期间商业银行增加了 9 家, 后来有两家倒闭。第四为稳定阶段 (1993 年至今)。1993 年 7 月 5 日澳门政府颁行了《金融体系法律制度》, 此后澳门的商业银行总数大致 22 个。该法例以澳门以往的经验为

基础, 并参考临近地区的模式, 其精神在于建立全球性银行的模式, 以及加强银行专门化的管理。这个法例的颁布有利于推动澳门的银行业向现代化、国际化进军。

二 澳门银行业的现状

1. 银行业分布状况。2002 年, 澳门银行共有 22 家, 其中总部设在澳门的银行即本地银行 11 家, 总部设在外地银行即外地银行 11 家, 共开设分行 131 家, 从业人员 3535 人 (见表 1)。由表中可以看出, 2002 年澳门的商业银行总数大致比较稳定, 外地银行和本地银行各占 50%, 银行的从业人数在逐年下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中, 外地资产的价值占 56.3%, 本地信贷价值占 33.5%, 其他资产价值占 10.2% (见表 2)。由表中可以看出外地资产在澳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 50%, 且逐年上升; 本地资产在澳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对外负债逐年下降。

表 1 商业银行总数、分行数目及雇员数目 期末数值

项目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1	2	3	4	5	6
银行总数	22	22	23	22	22
本地	9	11	11	11	11
外地	13	11	12	11	11
分行数目	114	138	134	132	131
雇员数目	3933	3728	3649	3611	3535

资料来源: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

表 2 商业银行资产及负债 (2000 - 2002)

期末数值 (百万澳元)

项 目	2000		2001		2002	
	价值	结构 (%)	价值	结构 (%)	价值	结构 (%)
1	2	3	4	5	6	7
外地资产	68927.7	48.3	74657.1	52.5	85545.1	56.3
本地资产	58947.0	41.3	54004.5	38.0	50863.9	33.5
其他资产	14844.0	10.4	13612.1	9.6	15484.5	10.2
总资产/总负债	142745.7	100.0	142273.7	100.0	151893.5	100.0
对外负债	24598.4	17.2	22861.4	16.1	23972.1	15.8
居民存款	83200.6	58.3	89654.2	63.0	96906.6	63.8
资本帐	6593.4	4.6	7000.4	4.9	7738.7	5.1
其他负债	28353.3	19.9	22757.7	16.0	23276.1	15.3

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

2. 澳门银行的业务情况。根据 1993 年澳门政府颁布的《金融体系法律制度》规定：“信用机构是指业务包括接受公众之存款或其他应偿还款项，以及以自负风险及为自己之方式批给贷款之企业。”澳门信用机构分为货币信用机构和非货币信用机构。货币信用机构具有创造支付工具资格，如发行机构、邮政储蓄机构、商业银行、开发银行和离岸业务银行。作为货币信用机构的商业银行，其业务包括信用、投资、存款业务。

信用业务主要是指贷款业务。贷款规则：贷款总额、对同一客户的贷款、对该行主要出资人及其所控制企业的贷款总额分别不得超过银行自有资金的 80%、30%、40%；停止信用业务情形：以本身的股票作抵押；对其管理阶层、监事会成员及其配偶和亲属所属企业、对上述个人的贷款总额分别超过银行自有资金的 10%、1%，对其雇员的贷款超过其年薪总和。

投资业务指商业银行可从事澳门政府发行或担保的证券的买卖、从事澳门信用机构、企业的股票和债券的买卖，但有限制。主要表现在：投资总额、对某一信用机构或企业的投资金额分别不得超过其自有资金的 60%、15%；在所投资的信用机构或企业中不得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 25% 的表决权；不动产、固定资产等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其自有资金；未经货币暨汇兑监理署 (AMCM) 许可，不得拥有与其自身运作等无关的不动产。

存款业务包括活期、定期、零存整取、支票

存款、外汇存款等。

3. 澳门银行业的特点。

(1) 商业银行业务比较单一，以传统的存款业务为主，分行网点密集。澳门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包括存款、放款、结算、外汇、保险、信托、证券、租赁、证券、投资，以及黄金、期货等。总体而言，占主要地位的仍是传统的存款业务。澳门的分行网点密集，22 家银行共开设 131 间分行，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面积就有六间银行。

(2) 高度开放，国际化程度高。澳门长期实行自由港政策，没有外汇管制，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很高。银行可自由制定不同的汇率和利率，本币在国内可自由的兑换；澳门流通中的货币和银行贷款大部分是港币和外币。80 年代以前，澳门流通货币中有 80% 左右是港币和外币，近几年来，澳门币有所增加。2002 年底，在货币供应量 M2 中，澳门元 275.44 亿，占 27.8%，港元折合成澳门元 512.242 亿，占 51.8%，其他货币折合成澳门元 201.910 亿，占 20.5%。在 22 家商业银行中，有 11 家在本地注册，其余 11 家分别来自葡萄牙、中国、香港等地，这些银行大多隶属国际知名银行。由表 2 可以看出外地资产在澳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 50%，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本地资产在澳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3) 对香港金融有较强的依赖性。在 2002 年的货币供应量 M2 中，港元占 51.8%，港元在澳

门的商业银行存款中占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澳门银行利率紧紧跟随香港银行利率的变动;实行与港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澳门的许多外资银行都以香港为地区总部。香港和澳门都是自由港,两地资金往来相通,但澳门银行的外汇、证券、基金、黄金、期货的买卖主要是由澳门银行透过他们在香港的地区总部或往来银行代理进行。

(4) 银行业务操作的电脑化程度高。澳门商业银行在常用电脑设备的基础上,使用各种新颖的通讯器材,安装日夜提款机、自动存款柜员机,对客户提 24 小时的存、贷款等各种业务,大大方便了澳门地区人民的生活。

三 澳门银行业的发展对策

发展澳门银行业应本着澳门经济发展的需要,本着为当地人提供便利服务的需要,同时积极开拓进取,澳门银行业应注意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1. 积极开拓银行新的业务。目前澳门的商业银行主要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已经远远落后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形式和客户的需求。未来非利息收入业务开拓的好坏,将决定各银行竞争力的高低。因此,银行业应在转变传统经营模式、提升科技能力和培养新型人才上下大力气,争取在综合理财、电子化服务等新的领域里有更多的业务创新。科技发展对银行带来了一定的冲击,21 世纪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市场趋向全球化,金融资讯通过电子媒介的传递,有助于提升金融市场的整体运作效率,因此网上银行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的潮流。目前世界上大多数都开展自己的网上银行业务,但澳门由于市场规模小,消费者对互联网缺乏认识,另一方面,由于相应的配套法律及法规还不健全,故在澳门拓展网上业务的压力比别的地区大。澳门银行业务范围狭窄,局限于传统银行业务,缺乏金融创新,不能满足人们资产多样化选择的要求。澳门银行业应实行业务多元化策略,在传统由贷款主导的银行发展策略基础上,加强个人投资服务的开展。

2. 提高防范银行风险的意识。澳门是一个高度开放,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地区,利率与汇率与

香港紧紧盯住,根据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旦发生金融波动,很容易影响到澳门的金融行业,从而增加了澳门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别是与香港的紧密联系,将导致澳门与香港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澳门政府应该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积极制定有关监管银行业的法律法规,消除其中隐含的危险。银行应积极提升行业的管理水平,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为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加强与香港,内地银行业的协调与合作,同时积极与世界接轨。澳门有以下优势:占据了优越的经济地理位置,背靠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祖国大陆,毗邻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面临南海及繁忙的国际主航道,澳门实行自由汇率政策、自由港地位以及政府对经济不干预。因此,澳门应当加强与香港和内地的协调与合作。有计划地逐步把澳门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区域性银行运作中心或区域离岸银行中心;利用与香港的紧密联系,澳门银行为香港金融市场发挥补充和延续的作用,将有利于澳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积极改善澳门的发展环境,促使澳门的银行业与国际的银行业接轨。

总之,澳门银行业应该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积极开拓,协调发展,为促进澳门经济发展,提高澳门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冯邦彦著,《澳门概论》,1999 年 5 月第一版,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
2. 庭瑞,《澳门金融业的历史与现状》,发表于《城市金融论坛》1999 年 12 期。
3. 《港澳经济年鉴》,2003 年第 683 页。
4. 任建军,《澳门银行业的发展历史和特点》,发表于《金融教学与研究》1999 年 06 期。
5. 廖永亮,《走进澳门金融》,发表于《金融经济》2004 年 08 期。
6. 冯邦彦,《澳门银行业的历史、现状与特点》,发表于《经济前沿》1999 年 Z1 期。
7. 王聪、杨苏,《关于建立澳门离岸金融市场的可行性探讨》,发表于《经济前沿》1999 年 12 期。

(责任编辑:陈丽君)

澳门博彩经营权

的开放与发展

刘 媛

澳门的博彩业在政府主导下，必将继续成为澳门经济发展之龙头产业。在澳门的公共收入中，旅游博彩业的税收占 70% 或以上，澳门 2003 年博彩税的收益达 100 亿澳门元。然而，由于长期实行专营制，澳门博彩业发展仍存在不少制度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2001 年特区政府宣布博彩业经营由独家专营改为三家专营，赌业经营权的有限度开放为澳门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文拟从法律制度的历史比较的角度，讨论澳门博彩业经营权开放所引起的多种经济关系的调整，及博彩业的进一步市场化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一、澳门博彩业的地位与经营权开放

澳门在 1847 年开始有赌博合法化的法令，而且一直由政府从中监控及抽税。1937 年，澳门政府实施博彩专营制度，博彩业的收入成为澳门政府的主要来源。1962 年，由何鸿燊、叶汉合组的集团“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赢得博彩业经营权，并整整经营了 40 年。在这期间，澳门政府颁布和修订了一系列的娱乐博彩法例，较重要的有 1982 年的《幸运博彩法律制度》、1986 年的《幸运博

彩批给合约》、1987 年的《幸运博彩批给合约补充条款》规定了博彩税的缴纳，旅游娱乐公司经营应承担的义务以及有关的管理监察制度，至此澳门的博彩业蓬勃发展。澳门旅游娱乐公司 40 年来获得的总收入估计达 1700 亿澳门元。同时，政府在财政收入与税收中也愈来愈依赖博彩税。1983 年为 29.3%，1998 年为 57%，1999 年为 59%，即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税收的 70% 以上皆依赖博彩税。旅游娱乐公司上缴给政府的博彩税从 1986 年到 1996 年每年增加 1%，1996 年起增至 31.8%。2001 年，全年博彩税收益超过 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并且，博彩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旅行社、酒店、港澳的海上客运、建筑、房地产以及娱乐服务等一系列有关行业及金融业的发展。与博彩业相关行业的就业人口占澳门总就业人口的 1/3 以上，形成以博彩业为龙头的特殊经济结构，博彩业的发展关系到澳门的方方面面，在澳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专营制度不可避免的弊病，也随着澳门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日益暴露出来，从法律及制度层面上对博彩业进行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2001 年 8 月，澳门特区立法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随后出台

26/2001号行政法规、215/2001号、216/2001号、217/2001号等行政长官批示,为博彩经营权的开放勾勒出一个框架。2002年2月8日,澳门政府将三个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权批给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永利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和银河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并于4月1日开始,打破了单一营运商垄断的局面。实践证明,2002年博彩业的开放效应已初步显示出来,博彩业的总收益显著增长,在澳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02年澳门博彩税收增长至77.65亿澳门元,较2001年大幅增长29.3%;2003年澳门博彩税收收入进一步增长至116亿澳门元,较上一年增长约49.4%。2004年前9个月博彩税收已达106亿澳门元。博彩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29.9%显著上升至2001年的32.2%,2002年上升至整个产业的33.3%。新的承批公司亦将为澳门创造近万个新职位,连同对周边行业服务及产品需求上升,新增劳动力需求基本能够吸纳现有的14000的失业人口。由此可见,博彩业的有限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现时和未来澳门博彩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博彩经营权的开放与其他部门经济关系的重整

法经济学认为,法律的经济意义是制定经济交易规则的依据,规则不同,交易成本就不同,因此,法律规条的确立和改变与社会效率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法经济学中的效益概念直接来自帕累托原理,在经济分析法学家看来,法律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效益原理支配的,法律安排实质上是以效益为轴心的。指定财产权和确定法律责任的规则,解决法律纠纷的程序,对执法者的限制等都可以看作是促进高效益地分配权利和义务、资源和收入的努力。法律可以为人们提供适当的行为模式,为人们行为在合法和不违法的情况下而获得应有的效益创造了前提性的法律条件。在

澳门,旧的博彩条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澳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达到法律促进效率的目的,造成博彩业发展的低效率。新《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的实施,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出台,重新对社会资源进行了法律分配,包括权利、义务、政策、信息、机会等,使得澳门博彩产业结构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得到相应的调整和发展。

(一) 博彩业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1、博彩运营方式和博彩借贷关系

1930年之后,澳门博彩业一直采用“分租赌厅制”。就是在依照与政府签订的专营权合约而开设的赌场内,设立若干赌厅和赌档,然后分租出去,交由他人经营。1962年,在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接手后,于1980年开始有赌团的出现,这些赌团可以从所介绍赌客的博彩中收取佣金,并可以在赌场内放高利贷。最近几年来,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实行“赌厅承包制”,将赌场赌厅的经营权,以付出一定权利金的方式批给包括部分“非专营公司”的商人(包括部分“社团人士”)去经营。由于这种经营方式没有严格、完善的管理制度,使得经营者(厅主)相互之间存在不平等竞争,而从业者之间对赌客的竞争也往往会引发斗殴。此外,一些个人亦能从赌客兑换筹码中收取佣金,这些人就是俗称的“叠码仔”。他们除了通过兑换筹码取得利益外,还可以通过向赌客贷款获得利益,即“放贵利”。依《非法赌博》的规定,这种给赌客提供贷款的方式,其性质属于“高利贷”,同时按照《澳门金融体系法律制度》的规定,“叠码仔”本身也不具备可贷款的信用机构资格。因此,“叠码仔”所提供的博彩借贷和赌场所提供的博彩借贷一样,均属违法。

博彩经营权开放后,为了更好地规范赌场内外的利益关系,澳门政府加大立法、执法力度,把博彩经营纳入了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第5/2004号法律(《娱乐场信贷或投注法律制度》)第一条“信贷仅于信贷实体将娱乐场幸运博

彩用筹码的拥有权移转予第三人”明确规定只能以筹码转换方式进行博彩信贷,在赌场内以筹码代替现金进行交易,避免了赌场内部转包经营与现行的金融信贷制度相抵触而造成的混乱及漏洞;第三条赋予承批公司或转批给人以及博彩中介人从事信贷业务的实体资格。信贷实体的代理权,须由政府逐一许可,且有关合同须以书面订立,政府亦可基于公共利益及合法性原则,要求修改合同内容;第四条“按照本法的规定提供信贷,则产生法定债务”将赌债的性质由自然债务转变为法定债务,使债权人可透过法律途径追讨赌债;第十一条规定容许信贷机构向政府、其它信贷机构、核数师等透露贷款人的资料,豁免保密义务。为配合业内运作,对此采取非常灵活的处理方式,只要赌牌承批公司或属下赌厅自定规则,便可互相交换贷款人的信贷记录。避免有人同时向多个博彩信贷机构借钱,减少坏帐风险。第十六规定条还把属于不法活动的博彩信贷业务非刑事化,将符合法律规定的赌博借贷活动与高利贷脱钩,解决其与其它配套法律须同步生效的问题。

2、博彩中介人

中介人的规范属博彩业规范中的重要一环。八十年代初实行的中介人运作机制,推动了博彩业的快速发展,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高达百分之二十。现在,澳门博彩业收益,有八成来自中介人的经营。印务局-第16/2001号法律对于博彩中介人的活动作出规范,法案对博彩中介人的佣金及其他收入订定税率。第6/2002号行政法规(《关于订定从事娱乐场幸运博彩中介业务的资格及规则》)对博彩中介业务的工作人员的性质加以定义,并就其资格审查、准照核发、报酬收取和应尽义务等作出详细规定。另外,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一条分别就承批公司、博彩中介人及其合作者之间的连带责任做了明确的规定,这大大密切了中介人与合作者的关系,合作者发生问题,博彩监察机构会追究中介人;中介人有问题,再追究到博彩经营公司,在行业内部形成一整套问责制度,有利于博彩业的行业自律和监督。第5/

2004号法律第三条规定了博彩中介人除可透过与承批公司或获转批给人订立合同而作为信贷实体直接提供信贷外,亦可作为信贷实体的受任人或代办商间接提供信贷。2004年10月,澳门博彩业管理中介人总会成立,增强了中介人、管理人、政府、博彩公司多方面的沟通。

新法令及经营权开放也推动了经营公司内部改革。永利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和银河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非常关注澳门博彩业人力资源的问题。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推行一系列优质管理改革,包括引进全新运作模式及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评核机制,提升竞争力。

(二) 博彩业与政府的关系

澳门博彩业具有与其他行业不同的特点,即政府特许的一家专营,而专营公司负担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责任作为代价,这被诺思称之为“通过转让垄断权,换取财政收入的专营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博彩业和其他部门之间形成了无效率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扭曲的利益关系。

在博彩专营期间,政府与博彩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幸运博彩专营批给合约》来体现和执行的,其内容包括:向政府支付溢价金和博彩税,出资和承担公共设施的建设,承担旅游对外宣传和澳门总督设立一基金会的费用等。澳门回归之前,博彩旅游业、公用事业、运输业等都实行专营制度。据估计,直到博彩经营权开放之前,专营行业的产值占了澳门本地GDP的60%以上,专营税收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50%左右。专营制度是政府对产权制度的一种安排,而产权安排是政府获得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经济规模小和低税率的情况下,用产权换取收入的专营权制度是一种便捷的解决方案。正如诺思所说:用产权换取税收收入是一种有效的短期解决办法,但这种短期解决办法会产生具有破坏力的长期后果。这种制度对内不能形成充分的公平和自由竞争的政策环境,对外处于半开放状态,不能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而不可避免的造成垄断,影响了资

源配置的效率,最终阻碍经济的增长,使得政府税收的基础更加薄弱。

《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调整和完善了政府监管体系,建立了一系列的组织,使澳门最重要经济行业的监管迈向规范化和公开化,进一步界定和理顺了政府与博彩经营者的关系。在新的监察体系中,对博彩监察厅及其附属单位的组织、职权以及运作做了更完备、有效的规定。大大改善监察及协调活动的内容,提高了监察机构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保障监察工作公平、有效地进行。例如《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法律制度》第十二条规定:“监管信贷业务属博彩监察协调局的职权”,并对其监察的对象、范围以及监察实体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解释。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表示:“《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法律制度》将博彩信贷业务提供一个可监察的环境,并配合着博彩业未来发展的需要。”

(三) 博彩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

旧的博彩专营合约规定,专营公司属下的分公司的进出口货物享有关税豁免收,对指定的公用事业项目拥有土地开发和经营的优先权,造成博彩经营者与其它经营者之间在旅游业、进出口贸易、房地产等行业的不平等竞争,形成一家企业垄断多个行业的局面。博彩经营权一分为三,不但推动单个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更推动全行业经营效率的提高,促使博彩专营公司在发展其他方面的业务时,与其他企业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这样澳门就有可能发展出更多的行业,同时旅游业也能全面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以博彩为内容。

来自美国的永利控股股东史蒂芬·永利(Stephen Wynn),是推动拉斯维加斯由一个纯博彩目的,转型为家庭娱乐度假胜地的先驱者;银河的管理公司及股东—威尼斯集团—则是大行会议及交易会等商务旅游活动的举办者。两家新承批公司均为经验丰富的外资公司,加上具有澳门本地色彩的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三者的市场定

位及重点各有不同,可望在澳对澳门的博彩旅游业带来“业务创造”(Trade Creation)效应,使澳门极端依赖的服务出口实现增长。三间批给公司的合约显示:未来数年内,在酒店、赌场、展览中心及其他大型娱乐设施的投资将高达 175 亿澳门元,而澳门过去数年的年平均私人投资在 60 多亿澳门元左右。新娱乐博彩区将会成为投资者发展旅游娱乐博彩业的理想园地,各种旅游设施、酒店、豪华赌场及其它与旅游娱乐项目有关的工程,亦会陆续进行,再加上其它的土地平整工程,对建造业的带动作用将显而易见。如澳门新口岸外港填海区的“银河”首座赌场的建设;澳门旅游娱乐和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已展开对葡京娱乐场和酒店的扩建;永利公司未来在澳门半岛及凼仔岛投资兴建度假村式酒店、商场、购物中心以及大型娱乐设施等。各种大型旅游娱乐设施相继动工,从事旅游业及相关行业的信贷需求将会更大,对澳门银行的业务发展将会愈有利,澳门银行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下,主动与博彩业结合,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务。博彩娱乐市场的逐渐形成,延长了旅客留澳时间,对酒店业、航空业、船务及旅行社等与旅游息息相关的行业有所裨益。因此,博彩业开放,博彩公司及相关行业加大了在澳门的投资,房地产业及租务活动显著增长。外资的进入,各行业的商务活动频繁,带动了澳门经济的发展,政府税收亦自然增加。

(四) 博彩业的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是指除了支付购买消费品的价格之外的成本,它包括消费活动对消费者本人的危害与对社会的危害。博彩业是一个有着巨大社会成本的产业部门(消费服务业),同时它也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在博彩经营权开放之前,专营公司所实行的“自由放任”的运作方式派生的外围利益非常丰厚,导致高利贷、勒索、贪污、洗黑钱以及有组织犯罪活动,对本人、他人以及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博彩业与犯罪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但

是通过法律及制度的完善可以减少或控制犯罪活动的频率。博彩业在博彩经营权开放后,对现时的法律制度、监察制度进行修改。在法律制度方面,将博彩借贷合法为金融借贷,允许赌场提供借贷服务;明确“叠码仔”为博彩经纪人,以避免其参与犯罪活动;规定博彩业的经营制度,以减低赌场违规现象;将互联网络博彩合法化;立法规定赌场对巨额赌资进行登记,以避免洗黑钱或公款博彩,保持博彩业在低犯罪率下发展,降低了博彩消费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另外,澳门政府在规范博彩经营的同时,还应注意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其他行业发展。当博彩业不再成为利益竞争的唯一领域时,围绕赌场经营而发生的犯罪也会相应减少,社会有秩序的局面就能够持久。

三、澳门博彩业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根据澳门的发展经验和西方国家的实践,博彩业的相关法律规则和监察咨询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博彩监察及协调司及其附属机构之间应当建立更深化的技术和手段方面的互动关系,用来指导政策的实施与执行,并进行有效的监督。例如,开放博彩经营权之后,新的赌场短时间建造成成为世界级的赌场需要行政部门的高效率配合。为此,政府在赋予博彩监察机构独立的地位之外,还应授予其对赌场的建设监理权及其各种设施的启用的最后批准权;还要确定对博彩监察机构人员的管制制度,给予管制者明确的指引,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率的执行系统。《娱乐场信贷或投注法律制度》虽然保障了博彩借贷法律中的主体和客体,但未对其内容进行具体的限制(规定其可借贷的上限);债权人可通过法院进行追讨债款,但是澳门博彩业面对的赌客是澳门居民以外的人士为主,当债权人通过法院追讨时,就必会产生法律冲突及司法协助问题,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再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现今的经营权一分为三,实质上使博彩业形成一种寡头垄断的局面。在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中,几个寡头企业往往为了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既展开市场份额的争夺,同时又相互合作(勾结),或者达成默契,以便联合他们的力量来影响和操纵市场,在经济上被称为“卡特尔”。卡特尔的成员往往利用其垄断地位,在赌牌垄断的期限内排斥其他竞争者,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国外博彩经营的先进经验来看,放开经营更有利于博彩业的健康发展。一个在政府有效监督下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对博彩业的发展更加有利。与此同时,澳门政府和博彩经营公司也应该看到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坚持发展自己的特色,加强对中国人乃至亚洲来客博彩习惯、偏好、心理、文化的研究,完善已有的博彩方式和行销方式。

澳门博彩业正朝着竞争化、透明化、社会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协调博彩业内部利益关系、博彩业与政府以及博彩业与其它行业的关系,形成澳门博彩业的整体优势,才能有效地推动澳门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谭志强,“澳门赌权与经济发展”,《比较法研究》(澳门研究专号),1999年第一期。
2. 黎熙元,“澳门赌场的利益结构与社会治安问题”,《九九澳门回归专家谈》,香港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12月。
3. 邓开达,《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出版社,1995年9月。
4. 王五一,“尝试理解世界博彩市场”《澳门2004》,澳门基金会出版,2004年6月。
5. 《澳门日报》
6. 李治洪,“澳门博彩业法律制度研究”,《澳门论学》(第一辑)
7. “博彩旅游业”,《港澳经济年鉴》,2002年,2003年。

(责任编辑:黎熙元)

回归后的澳门社会状况探讨

陈丽君

回归后, 澳门经济第一年便正增长, 经济发展势头很好, 2002 年 GDP 增长 8%, 人均 GDP 达到 12.3 万澳门元 (14300 美元), 2003 年 GDP 增长更高达 12%, 与此相应社会环境也大幅改善。

一、回归后澳门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一) 回归后澳门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城市之一

澳门的社会治安在回归前后是大不一样的, 回归前一年的社会治安差, 而在回归后的半年里, 社会治安已明显好转。以 1999 年 3 月为基期, 回归前的 8 个月中, 罪案增加的有 5 个月, 最大增幅为 4%, 罪案减少的有 3 个月, 最大减幅为零。而在回归后的 4 个月中, 每个月的罪案都在减少, 尤以回归后的第二个月的减幅最大, 达到 8%。以 1999 年 12 月 (回归月) 为基期, 则在回归前的 9 个月中, 每个月的罪案都在增加, 而且最大增幅达到 30%, 在回归后的 4 个月, 虽然有 3 个月的罪案增加, 但增幅不大, 不超过 2%, 而且这些罪案属非严重的暴力犯罪案。在回归后的第一年, 检察院领导刑事侦查及起诉方面共立案 9616 宗, 结案 6222 宗, 其中新检控的案件达 1181 宗, 检控人数 1608 人, 由检察院建议并经预审被羁押的嫌犯 257 人, 平均每位检察官全年处理刑事案件近 700 宗。通过对各类刑事犯罪的依

法惩治, 澳门社会治安取得了初步好转。澳门回归后的第二年, 2001 年 1 至 3 季度, 澳门暴力犯罪案件持续减少, 比 2000 年同期大幅下降 30.5%。其中谋杀案和抢劫案下降 30% 以上, 纵火案、勒索案、贩毒案分别减少了 41%、11.8% 和 42%。回归后的第三年, 2002 年首季侵犯人身罪、妨碍社会生活罪、妨碍本地区罪等其它各类案件比 2001 年同期减少了 1.6% 至 13.4% 不等, 谋杀案、勒索案则分别大幅下降 75% 和 46.4%, 绑架案也减少了 13.6%, 青少年犯罪数字同比降低了 13.7%, 涉及未成年人数减少了 36.8%。到第四年, 2003 年首季罪案共有 2398 件, 比 2002 年同期上升了 8.9%, 主要原因是一些轻微犯罪活动, 涉及侵犯人身罪、侵犯财产罪及妨害本地区罪等案件升幅较大所致, 如普通伤人、盗窃及作虚假声明等案件也有较大增幅, 但妨害社会生活罪、未分类之罪案明显减少, 下降幅度分别为百分之 24.3% 和 25%, 澳门特区社会治安状况总体上仍属稳定。

现在, 无论是繁华的闹市, 还是偏僻的郊野公园, 无论是在鳞次栉比的酒楼茶肆, 还是在高速运转的银行商号, 随处都能感受到治安好转所带来的安全感: 澳门市民能够在安宁祥和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能够悠闲地漫步澳门大街小巷。

(二) 回归后治安状况全面改善的主要原因

1. 澳门特区政府的努力。治安状况的全面改善, 首先得益于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特区

行政长官何厚铨一上任就明确表示要从根本上整顿澳门治安,争取在任期内使澳门的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为此特区上下群策群力,找到澳门回归前治安恶化的根源并对症下药进行整治,使治安实现标本兼治。

2001 年 10 月 29 日,根据澳门基本法组建的特区警察总局正式运作,其主要任务是协调澳门原有的两个警务机构——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的工作,加强统一指挥,提高警队打击罪案的能力,保证澳门的长治久安。特区警察总局的成立,一改澳门回归前警种繁多、多头领导和效率低下等弊端,使澳门保安部队的运作开始顺畅,这是警方提高效率的一大标志。而且警队内部也进行了多项改革:警员分工明确,奖勤罚懒,依法制裁违纪违法者,并加强对警员法律知识及办案技能的培训。2001 年以来,澳门警方还投入资金补充先进设备,增强技术力量;加强对外联络,与国家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香港警方及国际刑警组织等建立情报网,打击跨境犯罪活动。

2. 广大澳门市民的配合与支持。澳门社会治安的好转离不开市民的配合与支持,特区保安司司长张国华说到,澳门居民的支持、信任和合作使警方的工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成效。回归以后,当家作主的澳门人积极参与特区各项事务,维护澳门社会的稳定。市民通过各种渠道向警方反映意见、提供建议,在澳门形成警民联手消灭犯罪的良好风气。

3. 内地公安机关的密切合作。澳门警方与内地公安机关的密切合作为改善澳门治安起了重要作用。2001 年来澳门警方共派出 10 批 103 人次参加与内地公安机关的业务和学术交流活动,内地公安机关也有 9 批 83 人次到澳门进行各类交流,6 月签署并于 9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有关两地居民在对方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及非常死亡情况互相通报的机制”运作良好。

4. 广东与香港的警方协作。临近地区广东、香港之间的警方协作显示出巨大威力,三地多次采取联合行动,有效打击了各种类型的跨境犯罪。

5. 预防青少年犯罪和协助有偏差行为问题的

青年人工作。政府提供技术、财政和后勤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和促进青年团体参与地区或国际性的青年活动,协助青少年相互间的了解和合作,且通过这些活动,增强青少年参与发展澳门社会的能力;研究创立条件和机制,协助投身社会初次求职的青年人;改善青年活动的基础建设,为青年团体的发展计划提供空间;筹办适合青少年的休闲性或专门性活动,如培训、运动、艺术及公民教育等;协调公共、私人机构及家庭之间的计划并强化社工和义工服务,预防青少年犯罪和协助有偏差行为的青少年;加强为青少年而设的辅导和心理辅助服务,并计划将服务扩展至其家长和监护人;强化青年委员会的功能。

二、回归后澳门社会福利状况

早期的澳门社会福利服务是由民间社团为低下层市民提供的。澳门现代化的社会福利服务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是通过政府与民间社团合作的模式进行的,除了具有支持弱势群体功能外,也有预防及教育的功能,且服务项目的数量和性质都不断发展,目的是改善及提高人们生活素质。80 年代中期,澳葡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房屋等方面逐步建立了一套与澳门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社会保障方面,设立了社会保障基金,向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发放养老金、失业救济金、伤残津贴、疾病津贴、肺尘埃病赔偿金和婚嫁、生育、丧葬等津贴,并规定劳工因雇主破产或被解雇有权获得经济补偿;在公共教育方面,政府教育部门向有关学生提供学费资助;在医疗卫生方面,政府医院向孕妇、儿童、家境贫困者和特种病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在社会房屋方面,政府每年拨出公地兴建社会经济房屋,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居所等等。澳门社会福利处 1978 年度第一副预算册拨款 10 万元给予澳门社会福利处作为常备基金,将 1978 年度总预算册平常

支出部门款项数宗调动追加。

(一) 澳门基本法保障了澳门社会福利制度的延续与发展

为了使澳门居民回归后的福利待遇受到法律保障,澳门基本法规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上,根据经济条件和社会需要自行制定有关社会福利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这些规定清楚地表明:第一,制定社会福利制度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自治事务,不受内地有关政策的影响;第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责任使澳门居民继续享受原来已经享有的社会福利待遇,原有社会福利制度不改变;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及时调整和改进社会福利制度,使全体澳门居民都能共同享受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成果。

由于回归后澳门经济取得很好的发展,这使澳门社会福利制度不仅完全保留了下来,且取得了发展。澳门社会福利的宗旨在于通过援助金的派发和福利机构的社会服务,保护那些身处困境的个人或社会群体,其原则是平等、效能、合作和参与。平等指没有性别或种族歧视;效能指适当地提供援助金及服务以达到最低的生活条件;合作是推动及鼓励社区协助实践社会福利的宗旨;参与是鼓励有关人士积极参加。澳门社会福利与香港最大的不同是政府的角色不同,澳门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不如香港,澳门社会福利主要承担者不是政府而是社会团体。澳门基本法第131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服务团体,在不抵触法律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决定其服务方式。这一规定有利于发挥民间慈善服务机构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作用。澳门民间慈善和社会服务机构在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澳门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澳门社会福利服务的运作有三种主要形式:第一,政府提供社会设施,如场所、装置和设备等,交由某民间机构负责执行福利服务工作;第二,政府向民间举办的某一项福利服务提供技术或财政资助,并由社会工作人员对其有关服务提出意见,以助改善,促进其达到既定的服务目标;

第三,政府向民间举办的某一项福利服务提供纯技术性的援助。而澳门社会福利服务最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服务,它主要由政府的社会工作司、社会保障基金和民办社会保险制度构成。

(二) 回归后的澳门社会福利制度

1. 政府积极协助民间团体为公众提供社会福利

社会工作司是政府负责公共援助的主要部门,以政府的资金援助因种种原因而失去正常收入的居民,使之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澳门的社会福利委员会作为有关社会福利政策的顾问机构,协助特区政府推广和执行各项社会福利活动和措施,委员会有权对行政部门执行或共同参与的社会福利整体计划提出意见,对社会工作司年度工作计划提出意见,界定官方和民间机构社会福利的范畴,决定推出社会计划的优先次序。近年来,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社会福利处秉承平等、效率、互助和参与原则,积极地与民间社会团体合作,协助陷于困境的个人、家庭和一些弱势群体如儿童、老人、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和药物依赖者等。如对有关的福利服务法规进行了修订及做出具体的运作规范,其中主要包括澳门社会服务设施的执照制度、长者服务设施的运作规章以及复康辅助规章等法规;在复康服务方面致力协调及开拓相关的服务项目,并与民间机构合作,积极推动开展为患有绝症之人士提供院舍善终服务。

2. 澳门民间社团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也取得了发展

为了密切联系、加强团结和凝聚力,澳门各个不同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于2001年12月8日成立了澳门社会服务者协会。该协会的服务对象包括老、中、青市民。该协会设有组织联络部,其工作除拓展业务和发展会员外,还对澳门社会福利服务政策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并将部分建议向特区政府反映,希望特区政府尽量完善各项社会福利服务。

3. 政府与民间共同提供的社会保障服务

社会保障服务系统由政府的社会工作司、社会保障基金和民办社会保险制度构成。澳门人将

社会保障方式分为供款式和非供款式两种。供款式社会保障是依据有关法例,由雇主和雇员定期向有关机构供款,当雇员在规定的客观情况内不能工作时,即可获得保障服务。具体从事此类社会福利的执行机构是 1990 年成立的“澳门社会保障基金会”。保障的项目主要有养老金、残疾津贴金、社会救济金、失业津贴金、疾病津贴金、殓葬津贴金等。非供款式社会保障服务是一种社会援助,保障的项目主要有老人福利金、贫穷援助金、全无工作能力援助金、失去部分工作能力援助金、肺病患者援助金、失明人士援助金、补充援助金、紧急援助金和殓葬费等。

4. 政府与民间共同提供的其它社会服务

除了社会保障服务外,澳门还有以下各种福利服务:幼儿及家庭服务,主要服务项目有经济援助、幼儿照顾、家庭生活教育、家庭及婚姻辅导、领养及法院支持服务、防止虐待儿童和妇女服务、住宿服务、法律援助服务。儿童及青少年服务,主要服务项目有幼童服务、建立自修室和青年中心、辅导服务、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住院照顾服务、短期住宿服务、职业先修教育服务、康乐及体育活动。安老服务,主要服务项目有经济援助、建立老人中心和安老院、开展医疗福利和敬老社区活动等。康复服务,主要服务项目有医疗康复服务、教育康复服务和社会性康复服务。此外还有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预防及戒毒服务、为罪犯及释囚提供的服务、社区服务等。

为配合社会各阶层的需要政府所做的服务主要包括:在个人及家庭服务方面资助开设以妇女为对象之服务中心;开设以社区青年为对象之外展青年服务;协助民间福利社团建立新的老人院,对若干新开设的健康中心提供资助;设立弱智人士综合服务中心,增设弱智人士工作队及筹设各类相关的服务项目;资助已开办的民间社区中心;以全澳儿童及青少年为对象开展预防吸烟服务计划和推行健康生活教育活动;协助戒毒康复者组成自助小组开设戒毒康复外展队,资助民间戒毒康复院舍;设立院舍服务中央登记轮候制度;推广及开放为社会福利服务人员而设的视听中心服

务;举办各类社会福利服务培训课程;研究及开展全澳残障人士普查计划等等。

5. 政府与民间推动义工运动

澳门的社会福利服务受大众关注,现时特区政府各部门及其它社会福利社团机构的工作人员和义工,人数将近一万人,当中受特区社工局资助设施的工作人员达 1700 多名,其余为特区政府各部门及其它社会福利社团机构的工作人员和义工。

近年来澳门市民社会福利意识加强,对社会福利要求提高,社会福利已成为澳门市民关心的焦点之一。澳门社会福利发展将有以下趋势:社会福利范围和程度渐趋多元化,儿童、青少年、妇女、老人、失业者等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福利需求,需建立合理化的疾病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就业保障制度。因此政府需充分了解社会发展情况,并根据社会变化适时修订或制定新的社会福利政策,使社会福利制度公平及符合社会需要。

三、回归后澳门社会环境全面改善

除了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状况好转外,澳门的教育、文化活动、市民生活等等均取得发展。回归后,特区政府对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统一中小学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有关课程大纲已开始官立学校推行,接受中学教育的学生人数迅速增长,政府计划普及十年免费教育并扩展学校网络,使更多人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且澳门中小学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教师已达 80% 左右。2002 年 12 月,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主办“澳门高等教育联展”,推介澳门高等院校以便吸引更多本地学生入读澳门,在澳门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学间建立沟通的桥梁。由于经济的大幅度发展,澳门的失业率明显下降,工资普遍提高,因此澳门人的生活普遍提高,文化生活也提高。所有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已构筑起回归后澳门社会稳定的基石。

(责任编辑:周多天)

1960 年以后澳门文学叙事中的澳门意识

黎熙元

上个世纪 90 年代进入回归过渡期以来，澳门学界及公众舆论开始讨论澳门的社会特性与澳门人的本土意识问题。讨论所提出的澳门社会特性主要有两种表述，第一种是：澳门是东西方的文化熔炉，第二种是：澳门是以旅游博彩业为主体的多元微型经济体。2004 年澳门申请纳入世界城市文化遗产时，政府官员把这两种表述都作为澳门特性。澳门官方采用这一表述最明显的原因是：两者都是完全可视的；放眼澳门城市风景，有葡式建筑、中式建筑；古代庙宇、现代赌场。但这种表述却未有涉及澳门人的本土意识，即澳门人的文化认同。

与澳门相似，香港在回归前的 150 年中也经历了外族的殖民管治，香港社会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香港形成了本土意识，香港的社会特性可以表述为：发达和法治；回归之后香港人的文化认同是在与中国内地任何英国人相区别而确立的，“香港人”的含义可以表述为：具有随心所欲的消费能力、掌握中英双语能力和拥有民主法治政治理想的中国人^①。这种说法常常在社会舆论和官方的舆论中被使用。相比之下，对澳门的社会特性与澳门人身份的现有表述就显得含糊不清。近年的文化认同研究指出，本土意识是一种历史叙事（narratives）。叙事文本与围绕它所形成的读者群之间、通过阅读、解释、再解释的方式，构成了意识与观念的相互塑造和形构的关系（Habermas, 1989）。虽然文学作品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叙事，但文学作品能够通过仔细展示一个虚拟的世界，通过阅读时所伴随的情感宣泄、以及剧中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比照，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或接受自身所处的现实世界。同时，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产生的文学作品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它们往往互相反映和互相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通

过澳门的文学作品来探寻澳门社会的某些特征和本土意识，本文尝试进行这种分析。

一、澳门的历史与文学

本土意识是关于“我们是什么人”和“我们正在成为什么人”的集体想象。它与共同文化、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来源、以及怎样经常适应历史、文化和权力的角逐而改变和重构有关。在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文化认同是所有社会、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要话题。赛义德（E. W. Said）指出：“在 18 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欧洲对东方的霸权这把大伞的荫底下，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与发展、进化、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②

澳门曾经由葡萄牙人进行殖民管治，与香港相似，“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港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是两地殖民者创作的标准历史版本。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香港、澳门两个历史博物馆关于本地历史的叙述，一定能够发现其中的一致性。然而澳门自己的历史其实与香港有很多不同之处。概括地说，中、葡两国对澳门的政治影响长期处于均势，使澳葡政府推行现代西方国家统治的企图以及澳门本地人进行民族独立斗争的企图同时受到压制；澳门并没有在香港的带动下走上发展出口加工业或国际服务业

^① Gordon Mathews. 2003. "HeungGongYahn: On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 潘毅、余丽文编《书写城市：香港的文化与身份》，香港：牛津大学（中国）出版社 2003 版，pp51-73。

^② 萨义德（Edward W. Said）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0 页。

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博彩专营的发展道路。这些历史的选择对澳门人的本土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后现代文化批判中,西方殖民者所创作的东方文化文本当中所包含的殖民主义或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已被昭示于众,被殖民者自己的历史叙述和文化意识受到重视。澳门回归前的最后三十年是澳门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三十年。以 1960 年以后的澳门文学为分析文本,能够了解在不完全殖民管治和不完全现代化结构之中的被殖民者——澳门本地人的社会意识特征。

在澳门文学作品对澳门华人社会意识的作用特别显著。其原因是在葡萄牙殖民管治策略和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限制之下,澳门社会意识建构的重要媒介——公共领域发展不充分。大众媒体在 1980 以后才逐渐发展。1984 年澳门电视台开播,除新闻节目之外大部分时间在播向外购买的电视节目、尤其是香港和内地的电视剧,因此澳门的社会话语颇受香港和内地的影响。发展历史较长的媒体是 1958 年成立的《澳门日报》,它是以代表与殖民当局相对立的华人民间社会的角色出现的,直至回归以前,它都起着传达澳门华人社群意愿、中国政府意向的作用。

根据澳门作家所撰写的“澳门文学史”记载,在很长的时间里,澳门缺乏一家有规模的出版社愿意出版发行大型文学作品或文学杂志。自 1960 年以来,澳门文学作品的主要刊载媒体是《澳门日报》副刊(仲鹤,1998),其他纯文学刊物如《澳门笔会》、《澳门现代诗刊》、《澳门写作学刊》等都是 1989 年之后才陆续创刊的。《澳门日报》自创刊以来一直是澳门最重要的中文刊物,拥有最大的读者群和社会影响,日销量 8—10 万份。据澳门学者尹德刚研究,澳门市民每天读报者 37%,每周读报 3—5 次者 34%,每周读报 1—2 次者 27%;1998 年的调查反映,澳门读者读报首选副刊,其次是新闻,2002 年的调查结果相反,读者首选新闻,其次副刊^①。无论如何,副刊都是重要阅读对象。由是之故,我们可以认为,通过报纸副刊刊载的形式,澳门文学与澳门人本地意识的形成理应存在互相反映和互相影响的关系。

本文所使用的文学分析资料是 1994—1998 年之间由澳门基金会出版的《濠海丛刊》,包括《澳门离岸文学拾遗》、《从作品谈澳门作家》、《澳门短篇小说选》、《澳门新诗选》、《澳门散文选》、《澳门文

学评论选》。这一系列丛书汇集了 1960 年以后最有影响的澳门作家发表于澳门本地刊物和香港刊物的作品。由于各集的编者也是这些有影响的澳门本土作家中的一员,我们可以设想其选择的标准可能比较倾向于纯文学,从而可能把一些批判性的文章例如杂文等排除在外,当本文运用这些资料来讨论澳门意识时,便有某些资料上的局限性;但另一方面,这些资料却能够比较准确反映澳门作者的思考。

二、文学叙事中的澳门

《濠海丛刊》之《澳门文学评论选》(上篇:发展篇)收录了 21 篇文章,全部都是澳门作家论澳门文学特点及发展方向之作。这些文章所指出的澳门文学的主要特点有三,其一是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为主,现代、后现代派的作品很少;其二是作品主题大多基于作者个人生活体会和遐想,具有深厚社会体验和广阔历史背景的作品很少。其三是抒情性的作品多,批判性的作品少。收录于《濠海丛刊》的作品颇能够印证这些意见。《澳门散文选》中的作品主题,除了少数几篇带有批判性之外,其它基本上属于“写事抒怀”、“怡情益智”的文章(鲁茂,1986)。《十六的月亮》(沈尚青)、《澳门新八景随想》(徐敏)、《澳门的秋天红叶》(张裕)、《当车子飞过大桥》(冯倾城)、《马场抒怀》(翔鹰)等都是以优美的词藻描写澳门之美丽景色和宁静悠闲的一面,还有不少散文及诗作写作者的乡思、对故国、故人的深深怀念。1960—1980 年代的大部分新诗和旧体诗也多用赞美之词,1960 至 1990 年间澳门作家发表的短、长篇小说,包括刊载于香港刊物的“离岸作品”,例如《我曾经选择过》(林中英)、《似花非花》(鲁茂)、《一群夜校的学生》(楚山孤,1963)《洪流》(剑莹,1972)《小芬的一天》(江映娴,1972)则是以反映人间温情以及忠诚、守纪、知足、勤劳互助、重视家庭、忍辱负重等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为主题;故事当中所出现的争强好胜、喜欢挑战社会的角色最终都以失落为终结。按照澳门作家庄文永、缘源、陶里等人的评论,这些作品特点说明澳门作家注重人间温情,于是澳门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温情脉脉”的基调;澳门社会

^① 资料引自尹德刚 2002,“澳门大众传媒现状与发展方略”,载于《澳门 2002》,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

也常因此被定义为“温情脉脉”的社会。

然而,仔细阅读这些故事,我们却能够看到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覆盖下刀光剑影的冲突。这些社会冲突主要有三种。(1)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族群之间的冲突。余行心的《丝士咖啡室》描述了“我”,一个爱光顾咖啡店的本地华人,爱上了丝士咖啡店老板的女儿——一个漂亮的土生葡人女孩“丝士”,虽然“我”的生活习惯已经有点“洋化”,但仍然不能容忍那些光顾咖啡店的葡国士兵对待“丝士”的态度与举止,为了保护“我”的情人,“我”三番四次与士兵们打架;即使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然而,在没有“我”保护的两个月里,“丝士”就死了。故事里的华人、土生葡人和葡人三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以两男一女的竞争和冲突关系来表达,是相当格式化的一种殖民与反殖民权力关系的叙事模式。鲁茂的《白狼》则把土生葡人视为殖民者的附庸、或殖民者与非殖民者的畸形产物。故事描述了澳葡高官如何擅用职权袒护自己为非作歹的土生葡人私生子白朗,白朗做尽荒唐事,最终却在狱中由于被华人黑社会集团出卖而幡然悔悟。族群的关系在《白狼》当中比《丝士咖啡室》复杂,鲁茂对三个族群的黑暗面都有所批判。1990年以后有不少新诗表达出反殖民的情绪,如:懿灵的《牌坊上的窥探》:“记不起是个怎样的日子,思想穿上洋装的人,开始把轩辕文化,幽禁在墙隙里。无根的苦藓,在石板的暗影下苟且偷生。囚室里的不是圣像,是被绑的活人,耻笑着“自由”的人。四十根柱子,四十个叹号,在会议的大典里,又岂能写画民族枝叶的枯萎……”。江思扬(1992)《向晚的感觉》之(二)驱车登古原:“亚美打庐大马路奏着四十年代的慢板,它西端的码头大钟仍指着一九四八年十二点,要焦急的行人驻足、回忆——西洋水手的趾高气扬。”还有黄文辉(1993)的《历史对话》、苇鸣(1994)的《澳门的无题》、懿灵的《帷幕外》和陶里(1982)的《过澳门历史博物馆》等。土生葡人文学也是澳门文学的一部分,著名作家飞历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短篇小说《蛋家女阿张》;以及江莲达的短篇小说集《长衫》中的《施舍》和《承诺》等作品,很细致地写出了土生葡人长期处于欧洲葡人和本地华人的社会夹层之间而具有的独特群体意识,同时也通过分别属于不同族群的故事

主角之间的爱情遭受到来自各自群体沉重压力的悲剧遭遇来表现澳门三大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和隔离关系。

(2)阶级与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社会不公正。澳门社会的阶级阶层冲突与社会不公正有复杂的历史成因,有殖民者控制政治及行政特权的因素、有澳门垄断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因素、也有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歧视或者制度歧视的因素。胡根的短篇小说《海鸥》描写一个聪明好学的小男孩海牛,却因为身为渔民的孩子而无法像其他适龄儿童那样上学读书,不久就死于意外。胡根写出了社会对水上人的想象与“标签”:“我知道,水上人家的子弟难得上学念书,文盲挺多…唉,水上人,望天打卦的,满肚诗书拿到海上又有什么用?”^①胡根还写了作为教师的“我”的同事们对海牛勤奋学习故事的嘲笑:“现在十三、四岁的孩子,差不多要强迫他读书,那会有这样勤力的学生?除非神经有问题。”社群之间带歧视性的想象与歧视性社会制度之间是相互创造和加强的,其社会后果就是深化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格局。林中英的《重生》描写一个从事家庭佣工多年的非法居留女子“银彩”,历尽艰辛而获得一纸身份证明前后复杂的心理历程。描述了那些被称为非法佣工的家庭女工由于其非法居留的身份而不得不忍受主人人们的侵犯,揭示出人们怎样利用家庭佣工的不合法身份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并且把这些伤害行为合法化,所以,获得合法居留的身份对“银彩”这样的人来说其意义相当于“重生”。于是,“银彩”在“重生”后,决心一改以往的谨小慎微,以其社会之道“还治”社会之身——诱惑她的男雇主。反映澳门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的作品,还有谢草园的《后门》。吕平意的《失踪的猫》则通过猫失踪而鼠则大行其道的臆想,来比喻社会正邪颠倒的状况;诗人流星子写于1989年元月9日。澳府当局特赦十八岁以下无证青少年而感怀的《无题》、吴国昌写于1995的《遭否决时》,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不满。

(3)社会转变引起的矛盾以及澳门特定社会结构所存在的内部冲突。这类文学作品很多,各有不同的切入角度。获得1995年澳门文学奖的梁淑祺作品《等》,讲述一个当年身为黑社会团伙成员失

^① 胡根(1996)“海鸥”,载于陶里编,《澳门短篇小说选》,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第111-112页。

手杀死另一团伙成员的释囚林绰民与被杀者的母亲相遇的故事,透过释囚的忏悔,映照出发生在那个温情的咖啡室之外、血雨腥风的黑社会集团冲突。劲夫的《为谁呐喊》通过一个家庭的分裂反映社会转变所导致的社会价值观转变对家庭产生的冲击。与之相似还有周桐的《胜利者》、竹激风的《遗失的年代》、鲁茂的《似花非花》、沙蒙的《女人死了》等。陶里的《石卵之恋》和《安万达夫妇的遭遇》虽自称为科幻小说,其中却充满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与冲突。出现最多的主题,当然是关于澳门的特色产业:赌博,例如余心行的《快活楼》、发表于香港刊物的游静萍的《格力狗》、锒未残的《老顾客》;散文丁璐的《赌局》、苇鸣的《我不想知道》等。出现得较多的主题还有对澳门社会特点的反思,例如思想空间狭窄、社会气氛压抑等。例如周桐的《栖山盟》以一个异乎寻常的爱情悲剧来阐释社会的正常与不正常、规范与异端之间的关系;相同主题的还有散文陶天权的《窗帘背后》、鲁茂的《人生十拍》等。在新诗中,表达类似反思的作品有:懿灵《住宅街景录影》、江思扬《向晚的感觉》之“向晚意不适”、苇鸣《澳门 94. 6. 1 的黄昏》、舒望(1992)《视觉的构成》、陶里(1991)《蹒跚》、齐铁楷(1996)《日子,平平淡淡》。

三、澳门的文学意识与社会意识

虽然澳门文学叙事中包含着社会冲突的线索,但是作品却绝大多数以大团圆为终结,有些即使不是喜剧的、也只表现为无奈或惆怅,而不会付诸战斗。为什么澳门社会或澳门文人如此强调“温情脉脉”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澳门文学作品所描绘的澳门社会来看这种强调依从于两方面的社会需要。其一是澳门社会的封闭性与狭隘性。“澳门投稿园地不足,文艺青年就往香港发展。”(凌钝,1994)^①“我是在一九六八年开始投稿的。但觉得澳门太小,如写到澳门的报章,不获刊登,让熟人知道了,面子过不去。因此我的第一篇作品是投到香港《新晚报》去的。”(周桐,1988)^②“澳门从不留人。因为澳门有出入境自由,也因此而流失人才。澳门人是流离的,这里多的是过客;澳门政治是流离的,一时偏右一时又偏左;而整个岛是流动的,流动的岛不但向外流,还有以内圆心为目标的不断向内倒流的特性。而我只是内外圆间的边缘人。我不敢说自己不会外流,也不敢说能抵得住圆心的吸引力。可

是在我还清醒,还能分辨那句是心底话的时候,我希望能把所想得写成诗,提醒来日的自己,来日的人,你和我。”(懿灵,1990)^③“我不喜‘写实’,这由于世间忌讳太多;前面有火,我不是灯蛾。因此,只写些……梦呓式的……长短句。”(陶里,1992)^④这些文人的自白反映出澳门社会的封闭性与社会空间的狭隘性对文学思维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一个狭窄封闭的社会空间与强调温情自足、压制公开的竞争和冲突的社会意识之间是互相塑造和互相印证的。澳门的文人、或者澳门的任何居民要在澳门社会中求生,就必须认识这一点。

关于社会“温情”的第二种社会需求是由生存的困难引起。对澳门往事的描述中常见“澳门小城,民风淳朴,大人们犹记得小时候夜不闭户……”之类的集体想象。无论它是不是曾经存在过,由于周边地区政治及社会的大变迁,澳门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中转站。对多数新移民、以及澳门社会中下层的人来说,生活都是一个挣扎求存的过程,而且,澳门在六七十年代仍然是比较贫穷的地方。《洪流》中的小桃,需要带病整天穿珠片来争取生活费;《小芬的一天》中的小芬需要尽可能快而且准确的劳作来保持她的雇佣合约;《海鸥》中海牛小小年纪就要在船上劳作,“当半大人使”。即使如文学作者之类本应被视为“有闲阶级”的群体,在澳门也只能是“业余的”,白天有繁重的工作,晚上精疲力尽地“爬格子”。在艰难的生活中,温情是一种情感补偿。正如《等》中的林绰民经过黑社会集团的血腥生涯和多年的铁窗生涯、以及与家人、情人的分离之后,终于醒觉到要“回家”。

《澳门文学评论选》中各人对澳门文学发展状况的评论多有“不新”、“不多”、“不深”的意见。移民前曾为澳门人的香港青年作家陈锦德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必然产生它特有的文化形态:一种静态的、传统的、随机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先天上没有根深蒂固的人文基础,或者说,人文基础不能在一种静态的、传统的、随机的方式下巩固起来,发展起来。人文基础同民族意识不可分

① 凌钝(1994),《澳门离岸文学:代序》,载于凌钝编《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第1页。

② 周桐(1988),《我的小说创作历程》,载于《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出版:第84页。

③ 懿灵(1990),《流动岛·后记》,香港:香港诗坊出版。

④ 陶里(1992),“写在《蹒跚》出版之后”,载于《澳门现代诗刊》第五期:第94页。

割,当人文基础处在‘超稳定’状态时,民族意识没有生长的土壤,也无法产生与此相激荡的民族批判意识。没有激荡就没有文学,所以澳门文学一直低沉。”^①1990年以后,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期,文学风格或思潮的改变开始出现于新诗,《澳门新诗选》九十年代的诗歌当中出现了不少批判性的、反思殖民主义和民族意识的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反思澳门社会特性的作品。例如懿灵的诗集《流动岛》、江思扬的《向晚的感觉》等。黄晓峰与陈锦德都曾指出,澳门诗人对社会的认识不如西方大诗人奥登(W. H. Auden, 1907-1973),其1938年的作品《澳门》准确表现了澳门的社会特点:

救世主和门徒的洛可之图象
向呼么喝六的赌徒承诺身后的赌富
教堂与妓院比屋周旋,证实
信仰确能宽恕原欲。

既获免罪,沉沦的小城何惧
凡尘种种罪孽——尽管强人因此
车裂于市,政府也因此解体于一旦?

宗教的时钟总会按时敲响,幼稚无知的劣行
总能反证犯者的良知未泯
澳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奥登的诗的确深刻地描述了颓废掩盖了社会冲突的澳门,但澳门其实也有类似的诗同样深刻生动地描述澳门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的特征:

郁郁松山
蜿蜒长桥
高矗商厦
残缺牌坊
还有繁荣与稳定
堕入向晚的氤氲

纵无李商隐的暗喻或象征
谁也知道向晚之后便是深夜
虽无贾梅士的赞美或感叹
谁也知道笙歌艳舞撑起小城的兴奋
传说国际机场快要动工了
夜总会的攻关也很缺人
南方的牛犊渡海而来
在建筑地盘失足被逮
北方的蝴蝶乘车而临

在酒气弥漫的厅间穿梭

公海上不时上演炮艇与快艇的角逐

闹市中经常有蒙面人抱钱狂奔……

与奥登相反,江思扬写于1992年的《向晚的感觉》(一)“向晚意不适”描绘了繁荣喧闹掩盖社会冲突的澳门。倘若把两首诗并列起来,我们不难看到澳门的社会特性和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关系。

四、讨 论

澳门回归之后,澳门政府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原来陈锦德所谓静态的、传统的、随机的“超稳定”方式已经有所改变,我们也能够看见,对澳门意识的谈论已经展开。1960年以来澳门文学思潮所引出的两个重点问题值得有意参与“澳门意识”讨论的人们注意。其一,五六十年代澳门文学曾经普遍表达出爱国、爱家乡的倾向,今天的澳门意识是简单重拾过去的价值观,还是要揉合更多不同文化的意识?例如澳门是一个南欧与中国文化交汇的地方,然而本地华人的文学作品极少出现对南欧文化、尤其是其精华方面的描写,反殖民性质的描写倒是多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澳门华人对业已共存数百年的葡萄牙文化或者南欧文化的认识很少,那么澳门又将如何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其二,博彩业是澳门的主导产业,澳门的文学作品对此却从无赞美之词,一个本地居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却不是本地人赖以自豪的精神基础,反而被批评和警惕的对象,这在澳门本土意识形成或重构的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陷阱。

参考文献:

-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选译 2004,《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潘毅、余丽文编 2003,《书写城市:香港的文化与身份》,香港:牛津大学(中国)出版社。
- 《濠海丛刊》(1994-1998),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
- 刘登翰主编 1998,《澳门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
- 《澳门 2002》,《澳门 2003》,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
-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 1999,《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年版。

(责任编辑:周运源)

^① 陈锦德(1990),“《批判意识》和《特殊因素》”,转引于黄晓峰“澳门文学的预产期和现代诗的妊娠反应”,载于李观鼎编《澳门文学评论选》(上篇),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

机遇、挑战 与 未来发展路向的选择

——加强澳门中小企业竞争力学术研讨会综述

周多天

纵观 21 世纪,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是世界产业扩张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的高潮中,中小企业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意义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澳门中小企业如何实施新的政策,谋求更好的发展,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2004 年 7 月 16 日-17 日,由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主办的“加强澳门中小企业竞争力”的学术研讨会在澳门大学举行。来自内地的北京、上海及广州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 80 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大家围绕“澳门中小企业在新世纪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小企业对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中小企业对外交流与合作”和“增强澳门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四大专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现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澳门中小企业在新世纪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无疑为澳门中小企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遇。有的学者认为,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巩固发展,欧盟东扩计划的成功实现,美加自由贸易区的新发展以及 10+3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尤其是近期 CEPA 的实施和澳门进入“9+2”泛珠江三角洲大区域整合发展的新格局,使澳门中小企业面临新一轮机遇挑战并存的态势。正如澳门特首何厚铨先生在 2004 年 6 月初举行的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指出的“澳门凭借良好的对外关系和 CEPA 效应,正加快打造多个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这些平台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促进协助葡语系国家、欧盟国家和内地之间的中小企业,加快双边贸易和投资,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为内地首先是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的外拓内引,扮演好积极的服务角色”。

有的专家则提出,一方面中国的台湾、香港中小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近年来内地尤其是与澳门联系紧密的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也得到蓬勃的发展,这些都是对澳门中小企业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竞争和挑战的态势,特别是澳门目前面临人才缺乏,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中小企业发展中现代高新技术的应用比较欠缺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澳门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今后的当务之急是调整理念,加快经济转型,在竞争和挑战中巩固澳门中小企业的基础并提高其发展实力。

有的学者认为,澳门特首对澳门整体形势的分析,同样反映了澳门中小企业在未来的发展有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机遇。因为“澳门回归以来,由于特区政府与市民的共同努力,为澳门经济社会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为今后的澳门与时俱进协调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中小企业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有的专家认为,中小企业适应性强,反应快,

市场触觉敏锐, 营运成本低, 可以迅速地因应市场及经济转变而做出反应, 可以在短时间内扩张或收缩, 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科技创新, 加快技术转移。作为大企业的伙伴, 中小企业在某些程度上可以与大企业互补共同发展。根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统计, 在 APEC 成员体 21 个国家和地区中, 中小企业户数占各自企业总数的 97% 以上, GDP 比重占一半以上, 出口总值占 40% ~ 60%。另外有的学者谈到, 在中国大陆中小企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主要包括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例如, 内地 GDP 的 55.6%, 工业企业新增产值的 74.7%, 社会销售额的 58.9%, 税收的 46.2% 和出口总额 62.3% 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其次, 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载体。2003 年内地中小企业已超过 800 万家, 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 99% 以上, 提供了就业岗位已超过 75% 以上。再次, 中小企业已成为技术与机制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势, 例如, 内地专利约 65% 是由中小企业发明的, 75% 以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80% 以上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

有的学者则从广东的经验谈到中小企业的作用, 认为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支撑了广东整体经济连续多年的赶超式发展; 中小企业同时促进了业内的竞争与效率的提高; 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

也有的学者结合澳门的实际, 分析了中小企业在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澳门回归以来, 特区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例如“中小企业扶持计划”, “信用担保计划”及“专项信用担保计划”等) 使澳门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得到逐步改善, 促进了中小企业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澳门特区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的实施, 为内地中小企业进入澳门与本地中小企业合作发展, 乃至携手进军欧盟等国际市场, 开始搭建了政策等方面的平台。

三、关于澳门中小企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问题

有的专家从区域分工的角度出发, 认为澳门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中小企业, 受全球经济格局和周边地区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 因此, 为了能及时把握中小企业的发展态势适时调

整本身的产业走向, 通过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保持和发挥澳门本身“微型经济”体系和特色产业的优势, 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大力拓展澳门本身的优势产业。这方面也包括利用 CEPA 机遇和泛珠三角合作的有利条件, 更多考虑与周边地区联合发展, 例如利用澳门与珠海建立的跨境工业区, 融入珠三角地区相关的中小企业集群中, 以逐步克服“微型经济”本身的局限性。

还有的专家认为, 澳门的中小企业过去与广东特别是广东的珠三角的中小企业联系密切, 也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 今后在新的条件下, 更应该加强中小企业要在深层次的全面合作, 共谋持续发展的新局面。例如两地中小企业应当以澳门为纽带, 继续共同拓展欧盟等国际经贸市场。其次, 应当考虑配合中央政府提倡内地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战略, 制定帮助内地中小企业进入澳门创业的相关政策, 使内地与澳门的中小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

再有的中小企业学者认为, 澳门中小企业应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框架协议”的签定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与泛珠三角区域中小企业的联系与合作, 因为泛珠三角地区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 澳门中小企业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为进军泛珠三角地区市场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提供重要的条件。就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说, 澳门的中小企业一方面应当继续巩固过去 20 多年与周边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合作发展的有效形式, 并以此为基地, 逐步把企业发展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泛珠三角其他地区; 另一方面, 澳门中小企业也可以作为泛三角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海外市场的中介, 为这些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盟等国际市场穿针引线, 并在其中逐步发展壮大自己。

四、关于增强澳门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 提升澳门中小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是有待官民共同努力的长远目标。目前, 应当考虑的取向主要有: 一是接受现代企业管理的新理念, 规范澳门中小企业的经营行为, 包括尽快制订中小企业促进法, 建立稳定、长效的创业基金, 并建立一个职能明确的主管部门; 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家族企业的利弊, 以达到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的效果; 三是必须通过进一步健全企业的文化建设, 提高澳门中小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四是整合资源、整合市场, 提倡团队行为, 共同进退; 五是树立的品牌意识, 走精品路线; 六是培植创新思维, 开发创新成果。

有的专家则认为, 开放市场, 引进外资, (同时带来技术和人才) 鼓励竞争, 让有竞争力的产业扩张发展, 放弃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与市场, 这是澳门在区域一体化中形成自己新的特色产业提升的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有的学者认为, 澳门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必须成立直接向特首和立法会负责的中小企业局, 全面统筹中小企业扶助政策的执行和协调, 甚至改善中小企业的扶持计划和信用担保计划以及专项信用计划, 并且提高传媒及民间社团行动等对扩大扶助计划的影响力。

有的专家认为, 澳门中小企业面对大环境的转变, 本身的优势逐步被削弱, 因此必须引入新的元素才能为澳门中小企业创造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具

体方面应当考虑引入南欧国家的产品和人才促使澳门市场重现南欧风味成为自己独特的优势。

有的专家则认为, 澳门特区政府应当成立像新加坡 TAMASAK 控股公司那样的风险投资基金, 从事高增值和高科技产业的公司的投入不超过 50% 股本或者可以赎回的优先股, 通过提供股本以及规避部分风险, 鼓励中小企业转型并促进其升级换代。

有的学者还认为, 澳门必须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包括设立澳门中小企业融资银行, 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改善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 并且提高其融资能力从而达到高企业的竞争力。还有的学者从具体的层面分析了澳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解决方案, 认为可以考虑逐步拓展适合澳门特点的某些高新技术产业, 而在相关条件成熟时, 通过进入深圳设立中小企业板来达到融资的目的。

(责任编辑: 陈丽君)

中心简讯

1. 2004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由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办, 庆祝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报告之“名家论坛”在我校南校区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中心讲座教授叶嘉安先生, 为广大师生做“服务行业在珠三角的发展”学术报告。

叶嘉安教授现任香港大学地理信息系统 (GIS) 研究中心主任、香港珠三角发展研究小组组长、香港大学研究学院院长。他被国内数所知名大学、研究所聘为名誉教授, 还曾多次被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 (UNCRD)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邀请出席专家会议。在报告中, 叶嘉安教授用详实而具体的数据, 分析了珠三角服务行业近 20 年的发展, 探讨了香港服务业在珠三角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和主要存在的问题, 展望了今后香港服务业在珠三角的前景, 提出了“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珠三角”的重要观点, 并就有关问题同与会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 博得了我校师生的阵阵掌声。

2. 由香港总商会与南华早报主办的第三届珠江三角洲会议——“从珠三角到泛珠三角: 演变、充实与扩张”, 于 2004 年 11 月 1 日在广东中山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曾俊华、中山市市长陈根楷、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谢鹏飞、中央政策组珠三角委员会主席杨汝万教授、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主席冯国经博士等粤港两地政府高级官员、著名学者、企业家和知名人士参加了本次会议。本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内地民营企业的外向发展与香港服务业的商机”主题演讲。

3. 2004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2004 年度“桐山奖励金”颁奖仪式在梁铨据堂第一会议室举行。颁奖仪式上, 梁庆寅副校长宣读了颁发 2004 年度桐山奖励金的决定, 学校领导和嘉宾先后为获杰出教师和文科优秀中青年学者的教授颁发荣誉证书、奖金并献鲜花, 本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系五位获得文科优秀中青年学者之一。

4. 2004 年 11 月 13 日, 由国际专业管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公开论坛 2004 在香港举行, 该论坛邀请到有关政府官员、学者以及企业家、EMBA 学员等 50 余人参加。本中心袁持平副教授、博士赴香港参加, 并在论坛上做了“CEPA 框架下, 香港在泛珠三角的地位和作用”的专题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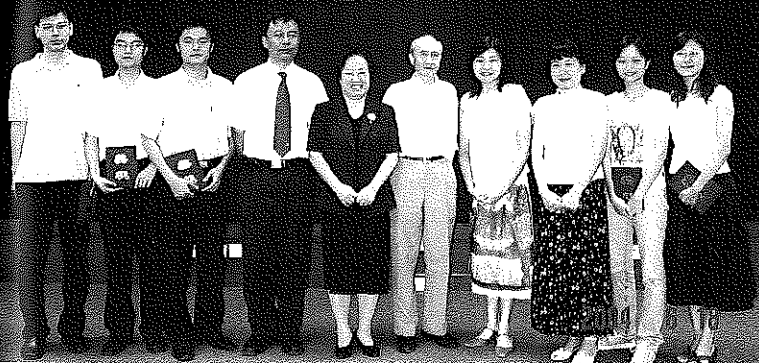
5. 2004 年 11 月 17 日 - 18 日, “2004 年广东改革论坛”在广东顺德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和广州地区的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的代表 200 多人参加了论坛。本中心李江帆教授在大会上作了“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广东第三产业升级优化”的专题演讲; 周运源教授为论坛提交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价格改革的回顾与启迪”的研究论文。

名家论坛：服务行

- 在本中心为80周年校庆举办的“名家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讲座教授叶嘉安先生作学术报告。



中山大学二〇〇四年“利丰奖学金”颁奖礼



- ◀ 香港利丰集团代表温美秋（右四）来校颁授2004年度奖学金，本中心五位研究生获奖。

- 本中心周运源教授（左）应邀出席“加强澳门中小企业竞争力”学术研讨会，接受主办单位赠送纪念品。



遵义会议旧址



- ◀ 本中心部分人员赴贵州遵义会议旧址参观学习。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举办的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课程
中山班同学结业留影（2004年10月）。